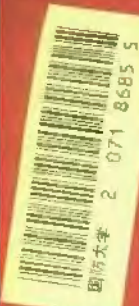


历史和结构——论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
历史学说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7907
历史和结构 —— 论黑格尔
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YANJIUCONGSHU

(川)新登字010号

Alfred Schmidt
Geschichte und Struktur
Fragen einer marxistischen Historik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1971

根据德国慕尼黑卡尔·汉泽尔出版社1971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陈敬章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忠 风

张 伟 译

历史和结构

——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历史学说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625 插页4 字数110千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2089-6/B·51

定价：2.85元

5-5-9/10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说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

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

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

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译本序

施密特的《历史和结构》一书，围绕历史和结构的关系，阐述马克思理论所具有的历史和结构的双重特征，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和历史方法，批判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割裂历史和结构的反历史主义，以及西方学术界盛行的非历史的研究方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述历史辩证法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作者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1931年出生于柏林，早年在法兰克福大学攻读哲学、社会学和历史。1962年获博士学位。之后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法兰克福劳动学院执教。1972年起一直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曾一度出任该校社会研究所所长。除本书外，其主要著作还有：《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论批判理论的思想》(1974)、《什么是唯物主义》(1975)、《作为历史哲学的批判理论》(1976)、《论唯物主义的三篇论文》(1977)、《批判理论·人道主义·启蒙》(1981)、《观念与世界意志》(1988)等。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大型计算机在人文科学中的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趋向数量化，历史思想的作用日益遭到驱逐，不断增长的历史厌倦症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界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最为典型的是，自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以数学函数

模式的词语系统阐述亲属结构以来，西方的人文科学正演变成无历史性的数学公式。实际上，对历史的漠不关心，不仅仅支配着西方社会的科学思想以及为之服务的结构主义、分析哲学等这样一些科学主义的哲学流派，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丧失历史意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者写下这部著作。

在哲学界，对历史持漠视、甚至敌视态度的，结构主义颇具代表性。它将结构看作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现象，认为值得研究的不是过程，而是结构；不是生成，而是已生成的事物；不是历时性，而是同时性。因此它专门讨论无历史性、无时间性的各种结构和模式，并搬用数理概念和数学符号进行表述。被称作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阿尔都塞学派，则深受这股非历史、反历史思潮的影响。作者指出，尽管该学派对马克思的解释，并未全盘否定历史，而是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的理论。它对第二国际理论家按朴素进化论理解历史的过于顺当的直线性观点的驳斥，也包含着一些真理的因素。可是，阿尔都塞把马克思所说的“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5页）以及“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同上书，第12卷，第758页），解释为不能在运动、顺序、时间的逻辑公式中思考相互依存的社会体系，而应首先思考总体的特别结构，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却是片面的。他指出，阿尔都塞甚至用对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的研究，去排斥对其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从而把马克思理论解释为“反历史主义”。正是他粗暴地把马克思的作

品分为两个孤立的异质部分，使历史(历时性)和结构(同时性)相互分离，那些有关历史的问题，或是粗略地被论及，或是一开始就被贬低了。历史和结构的割裂，构成其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出发点。

施密特依据《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经济学手稿(1857—1858)》和《资本论》等重要著作，驳斥了阿尔都塞缩小甚至否定历史在马克思理论中的作用的解释。他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同上书，第3卷，第20页)，这就说明了他们对历史的重视程度。马克思还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非历史和反历史的特征及其实质。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同上书，第4卷，第139—140页)这无非是想说明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可以永远支配社会。在施密特看来，阿尔都塞的解释同马克思理论本身是不一致的。因为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提供支持这样一种解释的论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没有像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拒斥历史的主题，提出超时性的方法论准则，而只有“无历史的结构”。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对马克思来说，在方法论上研究完成的结构对研究它们具体发展过程的优先性，但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对理论的建构是不相关的。所以，他在从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时，并没有停留在仅仅将其分解为它的各种结构这一点上，从而忽视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实际上，他在此书中不仅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且也建构了彼此相关的

各种历史发展形态。他以具体的历史方法分析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成，如何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与它们相对立发展起来的。

此外，施密特还引用其他哲学家的论述，来同社会科学中敌视历史的观点相对照。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非常强调科学史的重要性，主张每一门科学可用不同方式叙述，即先后相继地叙述科学发现的历史的叙述方式和形成概念化的观念体系的学理的叙述方式。一般来说，每一门新兴科学的研究均起于历史的方法，谁要真正熟悉所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谁就必须掌握它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在其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历时的和同时的考察方式相互贯通，彼此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各种经济范畴表达了历史运动的各个阶段，它们的内在联系构成现存事物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他主张历史过程的辩证法既不能被忽视，也不能被神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极为重视马克思主义说中的黑格尔主义渊源的。作为该学派的正统传人的施密特，更不例外。在施密特看来，黑格尔是一个专心于历史过程内在联系的第一位哲人，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上一世纪开创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历史科学的著作家。他认为，马克思是受惠于黑格尔的。马克思首创的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上的，但如果没有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那么这种历史观会变得不可思议的了。实际上，它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密切相关。可是，也要看到两人间的根本差别。尽管他们都认为实在是个过程，在黑格尔主义中，这个过程以理性的体系出现，人类史降为是它们的派生物，降为只是它运用的一个实例。与此不同，马克思则强调历史发展过

程的独立性和开放性，不把它归结为一种必须永远服从的思辨逻辑。马克思是唯物主义地接受黑格尔的，故认为历史不应是经验论者所认为的仅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是主体的想象活动。先前所谓自律的思想结构，不过是由现实的社会关系形成的。施密特还谈到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以以下三种基本方式从后黑格尔主义的学院历史主义中分离出来：

1. 它反对在自然和历史之间，从而在认识它们的方式之间要求绝对区别，论证了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人和自然的统一性在每一时代都随着工业发展而不断改变；

2. 它摧毁存在一种纯粹固有的理念变化过程的见解，反对黑格尔的只有整体精神才有“现实历史”的思想，认为除了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精神，不存在特殊精神。它把历史理论发展为构成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的顺序。

3. 它的“世界史”概念区别于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后者离开人的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或者只是从年代学上追踪对象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为《资本论》准备庞大的社会历史材料时，认识到对前后相继的各历史阶段用刻板的直线图式是无用的。马克思不仅论及物质生产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而且论及实际社会关系内部的显著的不平衡和分裂。

我们还可看到，书中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运用，指出他们寻求在唯物主义内部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间的统一。尽管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有优先性，而前者在任何地方均离不开历史基础。施密特介绍了恩格斯这个观点，只是在相对意义上，逻辑的方法有别于历史的方法，两者彼此相互交映。逻辑的（理论的或

分析的)方式,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同上书,第13卷,第532—533页)也就是说,思维主动的逻辑应该符合历史,但又要摆脱历史发展的偶然因素和次要成分,以求充分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为作进一步阐述,施密特还引用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有关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所运用方法的评述,讲到该书提供“资本主义的历史”,但是它以“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的形式提供的。接着他解释说,《资本论》第1卷的体系结构中商品——货币——资本的顺序,一个历史的结构同时也是一个逻辑的结构,反映出资本在西欧产生的实际进程。马克思分析的逻辑开端同它所研究的对象发生的起点相吻合。实际历史从哪里开始,论证的路线也必定从哪里开始。

书中也探讨了同历史和结构有关的马克思对叙述方法和研究方法的运用。马克思曾写道:“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24页)由此,施密特说,马克思的“叙述方法”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但在“形式上”,两者有所不同。在他看来,马克思严格保持对象历史和理论体系的区分。在研究中,从事实出发,遵

循对象的历史发展线索；在叙述中，则可从事物内在的结构出发，按排范畴体系的逻辑顺序，而不大考虑年代学上的先后相继。

他以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为例，它不是开始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史，而是先叙述各种具体的经济范畴，从商品抽象化出发，进而叙述交换、货币、商品流通，最后是资本。到了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方才详细叙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材料。施密特解释说，科学史家的马克思，是一个十足的辩证法家，不会盲目忠于科学的历史过程。无疑，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需要借助经济学史。但是，它的结构叙述逻辑，并不与将经验材料提供给研究方式的历史过程完全相一致。这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所研究的生产关系范畴的表述，不管是直接的，还是经过中介的，或者两者都有之，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历史上的，经济范畴从简单上升到复杂是思维进程，符合现实历史过程；另一方面，思想过程对于历史材料来说，又是自律的，而不是顺从地摹写它。思想过程对历史基础的相对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这两个方面一并存在。而正是这种相对独立性，才出现结构的“叙述方法”与历史的“研究方法”的区别。

在现代与历史的关系上，施密特认为，对作为沉积的和正在形成历史的现代的关注，构成革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他介绍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58页），即要恰如其分地理解过去，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马克思曾谈到，在自然史中，在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被理解。在社会史中，对既定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进行批判分

析，可以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也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

应该承认，该书批判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当今西方社会科学中非历史化倾向，阿尔都塞学派对马克思理论的反历史主义解释，提出“如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在于坚决地否定对历史的结构主义否定”的论断，并引用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较接近本意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历史方法的一些重要问题：对历史科学的极端重视；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基础和对黑格尔历史学说的批判继承；既不是无历史的结构，也不是无结构的历史，而是具有历史和结构双重特征的历史辩证法；逻辑的方法同历史方法的统一；在研究中，必须遵循历史发展的线索，在叙述中则应以逻辑顺序展开。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不同又以后者为基础；只有正确地理解现代，方能正确地理解历史等等，这些方面无疑是积极的，对我们有一定借鉴意义。同时，阅读这部著作，对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等流派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部著作确也存在一些错误和混乱之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属于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之列。因此，施密特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自然带上这种烙印。他在反驳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反人道主义”性质时，强调马克思并未像他所声称的“拒斥人性的主题”，认为“说马克思是一个‘理论上反人道主义者’，将会是错误的。”在施密特看来，“历史哲学仅仅构成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的一个方面，……它更多的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冲动”。也就是说，他以为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性和人道主义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题和历史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而，

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然而，在实际上，尽管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如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看到不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和语言的痕迹，即使如此，该书的主题也不是人道主义，而是废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而自马克思完成其世界观转变，创立了新的唯物主义之后，他就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共产党宣言》等论著中，对抽象的人性、人道主义采取一种鲜明的批判立场。显然，人道主义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曲解。再者，施密特又说：“马克思理论的中心点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世界观”。法兰克福学派依据马克思的许多论著曾以“批判”作正副标题，具有批判的特征，从其创始人霍克海默开始，就以“批判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施密特则由此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观。然而，事情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列宁还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186页），正是这个科学的世界观，构成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思想武器。施密特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本质同其世界观构成对立起来，说马克思理论“不是一种世界观”，显然是一个谬误。此外，施密特在书中讲到马克思和他的学生这样一些政治经济学批判家们“可被视作为当今（发展中的）‘结构主义者’”。在这里，施密特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种索朴的线性的历史观念的意义上使用“结构主义者”一词，但毕竟模糊了主张结构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主张无历史的结构的结构主义者之间的界限，从而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本书译自德国慕尼黑卡尔·汉泽尔出版社1971年版。在翻

译第一篇论文中，参考过上海财经大学密文湛同志的部分初译稿。此外，还得到复旦大学陈学明同志的热忱支持。在此，对他俩表示衷心感谢。

译者 1992年1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

目 录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的出版而作·····徐崇温··· 1	
中译本序····· 1	
主题：无结构的历史还是无历史的结构？ ····· 1	
历史和结构 ·····27	
科学是历史活动的自觉产物·····27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成”和“存在”·····29	
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32	
黑格尔的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37	
从抽象的东西上升到具体的东西的马克思主义的 方法·····39	
在思辨的辩证法中的“研究”与“叙述”·····42	
从“体系”到历史·····45	
科学的出发点问题·····50	
“进步—倒退的”方法·····52	
资本主义在世界史中的位置·····55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解释的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66	
葛兰西的真正的历史人道主义·····73	

唯物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	74
葛兰西的历史编纂学概念·····	77
作为一个克罗齐的批评者的葛兰西·····	79
葛兰西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理论地位·····	83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 的解释·····	85
对马克思解释的一些困难·····	92
在老社会民主党眼光中的《资本论》·····	94
阿尔都塞的再解释·····	95
“新科学精神”的哲学：作为科学的建构史的认 识论·····	96
阿尔都塞理论中巴歇拉尔主义的各种预先假定·····	100
构成物和唯物主义科学史·····	105
作为科学史家的孔德、黑格尔和马克思·····	108
结构主义的科学史和历史哲学·····	112

主题：无结构的历史还是 无历史的结构？

不断增长的历史厌倦症成为20世纪下半叶的特征，这在西方尤其是如此。当代社会科学高度精炼、趋向量化的研究方法，正日益把历史思想的作用驱走，而它在有关的启蒙运动和德国唯心主义中，在狄尔泰和传统的人文科学中，在生命哲学、甚至在存在主义中曾起过作用。赫伯特·吕梯(Herbert Luthy)提出了一个激烈而贴切的当代“社会科学数学化”的特征(他把它包括在“人文科学”之中)：

“作为现代学术成就重要地位的表征的大型计算机，即将覆盖整个人文科学。自从列维-斯特劳斯以一种运用数学函数的模式的词语系统阐述博雷洛(Borero)的亲属结构以来，一种把文明描述为封闭的交往系统，完全独立于个人的意识的文化社会学已经形成。文化社会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认为个人意识是由这种交往系统决定的……实际上，人文科学的分裂起源于受方法上的迷乱折磨的错觉，以至从贯穿于人类历史之内的意识的实在中，从同表示这种历史特性的价值和权力有关的种

种决定中摆脱出来,而进入无历史性的数学公式,这是可能的。”^①

当然,这决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对历史漠不关心不仅仅支配现代社会的科学思想和为这种思想服务的分析哲学,成者不仅仅威胁着历史学家存在的权利^②。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个人也失去历史意识。正如尼采所说,他们类似于动物停留在“最狭隘的视界之中”^③。

可是,这个发现不是中立的教育社会学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正如阿多诺断然强调的,一种本身由历史派生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在无数人历史意识的丧失中呈现出来。阿多诺写道:“意识的历史连续性的萎缩是比外表的衰退更多——它同资产阶级社会的进步原则必然是联系在一起的。”^④阿多诺宁愿用经济唯物主义的分析和解释这种当代意识同历史的疏远,而不是像通常那样,允许它作为一种科学规范出现,

“资产阶级社会普遍从属于交换规律,‘等量换等量’的平衡计算的规律,也确实达到无一例外的程度。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无时间限制的现象,比率和数学运算也一样,在它们的纯形式中排斥时间因素。因

^① 赫伯特·吕梯:《社会科学的数学化》,苏黎世,1970年,第28、31、37页。也请见吕梯的《历史关于什么?》,苏黎世,1969年,第44页。关于这种涉及语言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对历史的方法论上压抑的方面,请见赫特·马库塞的《单方面人》,波士顿,1964年。

^② 关于这个问题,请见赖哈德·维持拉姆的有益研究:《历史的要求与疑问,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与历史的地位确定的六篇讲演》,格廷根,1969年。

^③ 尼采:《对历史的运用与妄用》,印第安纳波利斯,1949年,第8页。

^④ 特奥多尔·W·阿多诺:《整理往昔有什么意义?》,载《论成年教育》,法兰克福,莱茵河畔,1970年,第13页。

此，具体的时间从工业生产的领域中消失，现在它对于积累的经验没有什么用处。像韦纳·佐姆巴特(Werner Sombart)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把传统主义原则归于封建社会，把理性原则归于资产阶级社会。但是，这种归属恰好隐舍记忆、时间和回忆，……作为非理性的残余正在受到清除。人们抛弃记忆的能力，急于同恒久的现状仓促和解的这个事实，反映着一种客观的发展规律。”^①

现在的讨论证明阿多诺是有道理的。他把历史意识(处在前科学阶段上的历史意识，形成于新近的罪恶的“压抑”之中)令人沮丧的衰退，视作在解放的时代普遍的“自我削弱”^②的征兆。在《启蒙的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试图用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去说明这种现象。他们论证历史的连续性和未受损害而仍有反映能力的主体性归属一个问题。根据这种观点，起主导作用的结构主义理论家对传统地按年月顺序整理历史思想的批判同对统一性概念和自我的内在历史性同样粗糙的批判结合起来，不过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他们取消认识论上的有争议的主体—客体的问题^③。

① 阿多诺：《整理往昔有什么意义？》，第13页。

② 同上。在《自然哲学》第258节中，黑格尔也把“被直觉的、单纯的变易”，不断流变的时词句“纯粹自我意识的我=我”看作是同一个原则。

③ 当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理论解释为“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与反人道主义时，这两个方面彼此相互制约并互为前提条件。甚至他(虽然是否定地)接着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观点讲下去，按照这个观点认识论与历史理论彼此相互交映。在列维-斯特劳斯一些著名的作品中，这种对历史的厌倦感尤为明显。他拒绝给予历史科学选择另一种知识形式的权利。关于这点，请见他在《未开化的思维》(芝加哥，1966年)的最后一章中对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批评性讨论。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自我的总体化的连续性……是受社会生活要求支撑的一种幻想……正如我们相信，

像整理以往的意识可能是必不可少的一样，它只是构成历史意识的一个方面。正如青年尼采称呼的，真正“历史上的个人”，不会因维护颂歌或拜敬以往各个时期而搞得精疲力尽。他们“对往事的梦幻使他们转向未来，……激发正义还将来临，幸福就在他们正攀登的山峰背后的希望”^①。他们已多么深刻地懂得，过去与未来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他们根据已经走过的历程来理解自己的今天，并且为一个更加人道的未来而斗争。但在这样做时——没有人比尼采更好地懂得这一点——不顾自己的历史的知识与教养，实际上他们在“非历史地”思想和行动，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没有顾及现存状况。他们在历史上的紧张劳动“不是为了抽象知识而是为了生存”^②。尼采并没有被这种情况所迷惑，因为他认为，“依靠人力把事件改造为历史，……人才能或为人”^③。对他而言，要害始终在于冲破各种呆

我们把个人历史趋向理解为一种连续的变化，历史知识似乎是证实内在感觉的存在”(同上书，第256页)。历史学家(很少像萨特哲学那样)不满足于从外向内描述存在物。“看来在重新确立我们同在我们之外的变化的本质的联系”(同上)。但是，按照列维-斯特劳斯说法，这并未克服这个困难，因为实际事件的概念，“历史事实”的概念，仍然是疑难问题。“在一次革命或一次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分解为众多的个人心理活动，其中每一个活动是无意识发展的转换，这些活动变为大脑的、内分泌的和神经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本身则同物理的或化学的秩序有关。”(同上书，第267页)。在列维-斯特劳斯极度的自然主义的还原中，历史荡然无存，这种还原导致这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批判过这种唯物主义(《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10页)。甚至一个不接受自然史与人类史之问有绝对区别的人，也会同意马克思而反对列维-斯特劳斯，即后者的事实比起只是自然的事实来有“更多”给予，因为我们创造了它们(同上)。真的，历史学家必定通过抽象与选择进行工作，并且在研究中，各个别事实总是处于“无限的倒退的威胁之下”(列维-斯特劳斯，《未开化的思维》，第257页)。但是，这样一些问题必定不会产生结构主义者假定它们必定产生的种种毁灭性结果。不用说，这个疑难问题在这里只能被提一下，而不能足够充分地讨论它。

① 尼采：《对历史的运用与妄用》，第1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8页。

板累赘的结构。

以辩证的意义出现在《对历史的运用与妄用》一书中、对历史怀有敌意的、并为“生成的文化、强有力的生命之流”服务的一种历史观，将决不能声称它是可与数学相比拟的抽象“科学”^①。尼采论证说，但它能使我们摆脱想象的虚假客观性，只是等待记录的僵化的事实。从尼采作为一个实证主义的反对者的观点来看“事实”总是单调的，它始终像一头小牛而不像一位神仙”^②。恰恰是谁具有历史意识即理论意识，谁就不做现存事物及其微不足道的变化的辩护士。这些人宁可抵制历史潮流而不愿随波逐流。他们同“各种事实的盲目力量、实际事物的专横”作斗争^③。

我们的世间同尼采的伟大的乌托邦设计之间的距离允许我们评价由当代历史意识遇到的各种困难。一种基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避免这些困难的。恰与设想的世俗反对者尼采的历史观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坚决地面对现状的^④。它认为，认识过去和未来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⑤。在强调历史思维中的反历史的要素方面，马克思也同尼采有关。正如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① 尼采：《对历史的运用与妄用》，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53页。

③ 同上书，第54页。

④ 如像顿哈德·维特拉姻现代史学家毫不怀疑，历史学家的“现状”具有“在历史知识中的重要功能”。请见他的《关注历史，论当代的历史理解问题十二讲》，格廷根，1958年，第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58页。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①

马克思以不同于黑格尔但又受惠于黑格尔的方式，把历史过程的主观—客观的“双重特性”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正是这种双重特性，近来一直受到挑战，特别是受到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家们的挑战。因此，阿尔都塞，这位受结构主义感悟的、马克思解释的奠基人声称，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能够汲取这个思想，即：“取消每一个起源和每一个主体……是绝对重要的，必须说：不仅在实在中，而且在科学知识中，绝对的东西就是无主体的过程”^②。在别处，阿尔都塞甚至更明确地解释说：“自马克思以来，我们已经知道，人类主体，经济的、政治的或哲学的自我不是历史的‘中心’——甚至同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们和黑格尔相反，历史并没有‘中心’，但是除了意识形态的迷惑外，具有一个根本毋需‘中心’的结构”^③。

不可从上述论述必然得出这个结论：即阿尔都塞学派马克思的解释必定会全盘否定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优先地位，这就必然意味着那些关于历史经验的内容的问题只是粗略地被论及，或者从一开始就被贬低了。从关于历史运动的统一的主体的问题已被描述为具有“意识形态的”特性的解释中，在历史理论的方法上还能保留什么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21页。

② 路易·阿尔都塞：《列宁与哲学及其它论文》，伦敦，1971年，第119页。

③ 同上书，第201页。

历史学家赖哈德·维特拉姆(Reinhard Wittram)曾经指出：“没有任何地方……历史像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中被赋予如此多的重要意义。”^①这肯定是正确的。然而，从当代的情况来看，这个命题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成为一个争论的主题。对历史的最新抨击不止是单纯的文化悲观主义。这种抨击是用难以消除的概念工具进行的。因此，阿尔都塞专心于科学的精确性，对“历史时期”的概念提出批判，也对它为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并最终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根据中所起的作用提出批判。

这篇论文继续最近几年我在认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已做的工作^②。我认识到，结构主义驳斥朴素进化论式理解历史的过于顺当的直线性、一种完全等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包含着一些真理的要素。因此，问题并不是在历史辩证方法和结构主义方法之间确立一个简单的对立面。阿尔都塞学派的马克思评注的每一个反批判，必须同时尝试把它产生的结果运用于自身。阿尔都塞的基本观点认为，马克思毕生的著作提出两个完全分离的“问题”，早期著作中的“意识形态的”问题和《资本论》中的“科学的”问题^③。但是，甚至那些不接受这种观点的人也将看到，在成熟期马克思的著作中，他们能论及囿于纯粹年代学的“历史主义”是多么少。

总之，在下述论文中正在被论证的(同阿尔都塞相反的)论题是：《资本论》方法的“建构的”方面能更充分地以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释为基础。就我试图维护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传统

① 维特拉姆：《历史的要求与疑问》，第23页。

② 请见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对历史的结构主义抨击》，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文集》，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9年，第194—265页。

③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纽约，1970年，第13页。

而言，我将通过考察辩证法在《资本论》中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首先同黑格尔《逻辑学》联系起来予以实现。对阿尔都塞的不断批判，在许多问题上转变为对马克思的正面叙述，这种叙述是从政治经济学的素材到与之不可分割的认识论。

这篇文章应该对唯物主义历史思想的认识论的反思出一份力。这种反思最近在各种场合已经开始了，并且特别在政治意义方面它构成一个重要的任务。在应用历史理论(Historik)这个术语时，我要提到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的著名的一部著作，他以部分批判地接受黑格尔的方式，把这本书看作为一种“科学的历史理论……看作为这种理论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① 德罗伊森的著作，不顾这种理

^① 德罗伊森：《历史理论：关于历史的百科全书与方法论讲座》，慕尼黑，1967年，第377页。有关德罗伊森的思想请见勒森的两部著作：《领袖历史：德·罗伊森的历史理论的起源和创立》(帕博博尼，1969年)和《德罗伊森的政治思想与历史科学》，载《政治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制度》，(慕尼黑与维也纳，1968年)。勒森对该书怀有极大兴趣，研究扎实贯通。在上面提到的后一篇论文中，勒森指出，在德罗伊森著作中存在着“一种在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典型的政治与历史学的统一。对德罗伊森来说，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历史，对政治实践同时是一种策略，而政治实践的理论指导线索出自科学地考察传统与往昔的当时状况”。(第171页)“如设想历史构成为付诸实践的、现状的自我理解，那么，对这种以非政治化的历史学为一方，以非历史化的政治为另一方的抽象抉择，必须予以放弃”。(同上)按照勒森的说法，德罗伊森的著作是为历史科学辩护，“由于痛苦地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实践方面的丧失，而使得历史科学‘再次声述’它的政治权利”(同上)。在这个方面，勒森对德·罗伊森解释模糊性的理论也至关重要，这种评论把德罗伊森视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先驱者……这种理论侧重于认识历史内容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历史内容，因此它摒弃同当历史有任何明确的关系，这样一种解释使德罗伊森的历史理论非政治化了。一旦正式成为历史解释学和历史事件一结构的概念工具，作为一种历史性理论的这种理论，就丧失了它在当代史中的立足之地”(同上书，第175页)。当然，勒森补充说的，“把德罗伊森的著作归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科学政治化的标题之下，将同样是错误的。……因为在德·罗伊森著作中，历史描述、政治同理论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是洞悉发展的成果……发展的各种结果直接决定当前历史问题的讨论”。《领袖历史》，第62页。

论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显著区别^①，包含大量的、特别在今天值得思考的东西。一位德罗伊森著作的评论者耶尔恩·勒森(Jörn Rüsen)强调指出，德罗伊森在他的《历史理论》中，于“政治学、历史科学和历史理论中”察觉到“对单独意图而言具有一些同等重要意义的要素”^②。对德罗伊森来说，在这三种活动中没有一种活动是先验地优先于其它两种活动的。一切依赖于只是从现代及其需要的观点看来，反过来方能被阐明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他的历史概念寻求在“历史科学的主体和客体互相融合之处，即是在此地发生的、或存在于记忆和期望中的历史前面”^③。通过统一“历史认识和历史实在”，把历史科学和政治连结在一起。上述论述也表明德罗伊森的书中有一种唯物主义的因素，即科学的、理性必须阐明有关它的论题的、前方法论的、社会实践的先决条件^④。这就是霍克海默规定的作为从“传统的”理论到“批判的”理论过渡的构成。有谁想要否认德罗伊森的问题(在细节上已作必要的修正)，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的问题？

德罗伊森承认离开历史内容的描述历史方法的相对权利。可是，

^① 例如，德罗伊森的历史理论把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二分律——以这样的方式确立的二分律已经是站不住脚的。——作为它的出发点(请见第13—19页)。“自然史无疑只是类似历史性质。在非常意义上说，历史仅是伦理世界的历史，人类世界的历史”。确实，有一小段落(请见§51)，德罗伊森谈到“人手干预自然界生活及其改造……具有真正的历史性质”。但是他未从这个见解中得出一些必要的结论。已经加工过的自然及包含特定阶级关系的利用自然的各种社会形式、作为决定性的要素渗入历史的唯物主义本体的这类事实，仍然是没有讨论。

^② 勒森，《德罗伊森的政治思想与历史科学》，第174页。

^③ 同上书，第175页。

^④ 参见同上书，第174页。

“这样一种形式和实体的分离最终只有一种空谈理论的性质，……为了掌握实际的和变化着的〔历史诸方面的〕多重性，〔它〕只是我们的思维必须进行的一种理论上的分离。只要我们实际从事历史研究，实体和形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彼此总是处在共同性和相关性的各种联系之中，这变得一清二楚了。”^①

根据这点产生出德罗伊森的(显然是受黑格尔启发的)命题：“历史方法的本质是为理解而研究。”^② 不管预定的认识论，方法是由“它的材料形态特征”决定的^③。换句话说，历史科学处理并必须适应总是已经结构化的材料。可是，在这样做时，它不产生一种“今昔的镜面映像……而相反产生一种不断扩大、补充和纠正自身的今昔概念”^④。对于德罗伊森来说“简单同一的和永恒的自我是不可想象的。更确切地说，它的“内容”总是是“一种已中介的、生成的，即历史的成果。”^⑤。

与这个词的后来的〔如在舍勒(Scheler)那里的〕用法形成对照，德罗伊森并未把历史理论(Historik)理解为含有一种要求世界历史总体知识的纯理论的结构。他像怀疑“历史世界的物理现象”一样，怀疑“历史哲学(或神学)”^⑥。幸而，像从康德到卢卡奇、萨特这些思想家一样，他坚持这种已遭到结构主义者攻击的原则，即被认作为“普遍的”、不断自行发展的“自我”的人性

① 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第189页。

② 同上书，第328页。着重字是原有的。

③ 同上。也请见第415页，在该处德罗伊森拒斥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

④ 同上书，第7页；也可参见第345页。

⑤ 同上书，第332页。

⑥ 同上书，第331页。

构成“历史的主体”^①。可是，德罗伊森是谨慎的，没有以武断的方式去规定历史过程。“历史理论……必须给自身提出形成历史的思维和研究的原则的任务。”它包括它的“方法论……历史研究的主体的系统化，以及一些描述历史研究结果的题目”^②。

按照德罗伊森所说，如果历史的方法反映它的素材的特性，那末它对于它的任务来说是可以胜任的。像马克思提到维科(Vico)那样，德罗伊森强调说，在最严格的意义上说，只是那种“用人脑和人手构成的、打上了烙印的和触动过的”东西同我们有关系^③。他继续说，关于这些历史产物，“我们是并我们感觉自身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并且处在相互关系之中的”^④。尽管德罗伊森不用辩证法术语，但诸如上述一些思考倒是具有辩证法性质。历史的东西的主体—客体结构把研究者提到理论的抉择高度。他必须同时进行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同样的要求适用于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互阐明。只有在更多地包括社会整体的可理解的关系中，个别的经验研究的结果才成为一种“按其自身来说是总体性的”^⑤个别性。然而，把前者绝对化将会是错误的。

尽管德罗伊森关于历史的方法论和百科全书的演讲存在一些缺点，它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自我反思，不仅起源于上面提到过的当代历史理论中的问题，而且起源于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既然这些讨论导致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的客体领域的问题，那末我将简明扼要地重述它们。

① 德罗伊森，《历史理论》，第267页。

② 同上书，第331页。德罗伊森在第332—366页上解释了他的历史理论的这三个方面。

③ 同上书，第328页。

④ 同上书，第329页。

⑤ 同上。

在涉及青年狄尔泰的“历史理性的批判”这点上，德罗伊森的活动属于后唯心主义时期。作为对黑格尔主义的思辨大量讨论渐趋冷落的结果，“历史的知性”则作为一种新型思想出现。因而，存在于教条的历史形而上学，各个单门历史学科的研究实践和当代政治历史之间的界限模糊地带中的各种问题变得尖锐了。另外，在19世纪上半叶已经发展起来的人文科学需要一种从方法论上可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的“基本原则”。

狄尔泰，这位生命哲学的哲学家，试图为人文科学提供一种永恒的、从心理学上和人类学上奠基的并同无界限的相对主义相结合的模式。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证明，这个努力必定是多么脆弱和自相矛盾^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上一世纪中对历史思维的突破作出贡献的著作家中的两位著作家。他们正视这个困难的问题，即从复杂的、无限丰富的历史实在中，理论的形式如何能形成我们称作“历史”的问题。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开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历史科学”^②，以下列三种基本方式从后黑格尔主义时期的学院历史主义中分离出来。

1. 它反对在自然和历史之间，从而在认识它们的方式之间要求绝对区别，或者甚至于要求绝对矛盾的所有倾向。相反地，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自然和历史都属于同一个世界，一个由集体的实践确立其认识的（而且日益现实的）统一的

^① 参见卢卡奇：《理性的毁灭》，柏林，1954年，第341页。卢卡奇对生命哲学的驳斥，可能恰好说中了狄尔泰的极其难解的著作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高尔森、哈贝马斯和利伯的研究表明，卢卡奇的批判并未解决这个问题。曼弗雷德·里德尔的论文《狄尔泰的人文科学中认识论批判的主题》，为此指出了至今未得到多人注意的和费尔巴哈、马克思与尼采的历史相似现象。见《解释学和辩证法》，第1卷，蒂宾根，1979年，第233-2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0页。

世界。“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①。因此，他们论证人和自然的统一并不是（像以前的唯物主义已假定的）仅仅具有创世性，而是“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②。马克思和恩格斯驳斥费尔巴哈，说他不理解：

“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供给给他的。”^③

这些思考对于历史理论来说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沉迷于“历史方法的实在论。”^④相反，他们明确地反对“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离开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的”^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0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③ 同上书，第38-39页。

④ 乔治·席美尔把这个理解为自然知识的素朴实在论的历史编纂学的对应物。在他的著作《历史哲学问题》（慕尼黑和莱比锡，1922年）第54页中写道：“总是向历史方法提出让我们‘按照事物原来的样子’考察它们的任务。同这个观点相反，一个人必须明白，每一个认识行为就是把直接给予的东西转换成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有它自己的形式、范畴和要求。当事实……进入科学领域，它们必须回答实际上从来向它们提出的某些问题。为了满足知识这些需要，它们得到一个整理的排列，……此种排列可以说不关照实在，并从它们中创造出一种新的结构。”

⑤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6页。

应该直接强调的是“活动”，在这种意义上，不仅涉及到把个别的东西作为一种完成的直接性来表现的社会生活过程，而且恰好同样多地涉及到探索经验研究结果的多重的自然历史的和社会历史的中介的学者的这种（按词的严格意义上的）批判的活动。这种材料（日常思维对它来说依然是无意识的）客观的中介性质符合这种理论任务：即“使眼前的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较精确的研究而确定的感性现实”^①。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要费尔巴哈把事物的外表同它的本质区别开来这并不错，但是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光’，即戴上‘眼镜’来观察感性，便对感性束手无策”^②。

实际上，由于对物质生产过程的严肃认真的叙述，“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③。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揭示例如“实体”和“人的本质”的形而上学概念所指向的“现实基础”：“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④，就成为是可能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把这些作为纯粹胡说而放弃思索，相反从中获得它的真实内容。思索涉及到他们的唯物主义研究的概念工具，用来“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层次间的连贯性”^⑤。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运用朴素的方法论，作为他们同唯心主义决裂的结果，他们并未要求一种有局限性的实证性。相反，正是从黑格尔那里，他们知道表达客体是多么重要。未从理智上把握的历史，用他们的话来说，就等于“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1页。

④ 同上书，第33页。

⑤ 同上书，第21页。

些僵死事实的搜集”^①。对比之下，在唯物主义框架内工作的历史学家必须专心于把握客体，即专心于“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②。

2. 唯物主义历史理论和资产阶级历史主义之间(同这个讨论有关的)更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摧毁存在着一种纯粹固有的、理想的事变过程这种见解。

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以他的只有整体精神才有“现实历史”的思想^③，指出了通向对“理念史”——被视为各个专门的和独立的部分史的总和——的唯物主义批判的道路。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写道，“整体精神唯存在于时间中，而被设定为是整体精神本身的特定体现的各种形态，相继不断地呈现自身。因为，只有整体才完全地具有现实性”^④。

从黑格尔哲学的总体性思想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过程理论发展为构成社会经济形态有规律的顺序。按照他们的观点，“生产关系”与其说是被构想为(同其它次要因素相并列的)一种决定性“因素”，倒不如说是被构想为一种结构概念。他们在不同时期所采用的结构使一个新纪元变成一个具体的、可确定的总体性。唯有这种总体性才有一种统一的理论可通达的历史：

“甚至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他们的可以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33页。

③ 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柏林，第533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④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纽约，1867年，第49页。

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失去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

从这个论点中可以得出不可能把历史建立在人类学上的结论。如果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除了真正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不存在“特殊的精神”，那末历史过程就不表现为能当作一种持续的、统一的“意义”来解释的东西^②。人们及其文化服从于彻底的短暂性^③。

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返回到“理念史”这个有争议的概念。当然，狄尔泰谈到的始终是既存的客观精神世界。可是，对他来说决定性的东西仍然是只有在心理学上，也就是通过自身证实的个人“体验”才能说明这个世界的思想。他把体验的统一性建立在“心灵生活的结构关系”^④之中，根据狄尔泰的观点，这是一种我们不能进一步考察心灵生活后面的现象。他继续说，“因为一些文化系统……已从人的心灵的活生生的联系中形成，它们唯有在这种心灵的基础上才能被理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在《社会研究杂志》上的霍克海默的马克思的解释，着重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不可否认的反形而上学的，甚至虚无主义的因素。对于诸如布格赫或卢卡奇那样的解释者，历史唯物主义的这方面较少显现，因为他们坚持人类作为普遍的历史主体。这种人道主义主题也出现在成熟期马克思的著作中。

④ 狄尔泰：《全集》，第6卷，斯图加特，1957年，第237页。

心理事实构成文化系统的最重要的因素。因此，没有心理分析就不能理解它们”^①。

对狄尔泰来说，如果在这种意义上构想的心理学，成为对历史必不可少的、辅助学科的话，那末在另一方面，他寻求从历史客观性中推导出心理学可能有关的内容。例如，他写道：“个人所达到的自我认识，只是在历史中，而从来不是在内省中。”^②实际上，狄尔泰恰好像当代结构主义者一样，认为甚至传统的历史哲学的问题——历史过程无论是有一种内在的“目的”还是有一种“总趋势”——都是完全片面的^③。他继续说，历史与其说是在一种直线前进的方式中进行的，不如说是在“各个互相联系的结果”中进行的^④。按照他的说法，“〔必须〕从个人生活的结构直到最终的、最全面的统一中探索历史最明显的意义，是在‘始终是现存的’这些结果中；它是历史在每个场所和每一瞬间所具有的意义，决定以往发展的意义，并将支配未来的意义”^⑤。狄尔泰写道，无论谁研究文化领域的结构，都必须论证这些“存在于历史世界结构中的规律”^⑥。这样，对狄尔泰来说，关于在历史中的一种发展着的绝对的问题，是一个非科学的因而也是无用的问题。

这样，狄尔泰（他自己把“每个社会条件有限的……意识”

① 狄尔泰：《全集》，第5卷，第147页。

② 狄尔泰：《全集》，第7卷，斯图加特，1958年，第279页。

③ 同上书，第172页。

④ 同上书，也可参见第307页，在该处狄尔泰直接向下列思想挑战：“在历史事件的同时发生和先后发生中，……它们……具有推演出联结它们的因果关系的或支配它们的发展规律的，以及在它们中和通过它们进行的进步或发展的手段。”如今结构主义历史学家的论证没有什么不同。

⑤ 同上。

⑥ 同上书，第173页。

描述为“个人解放的最后一步”^①的激进的历史思想停步于逻辑上先于实际事件的静态本体论中。因为他不能辩证地克服无法摆脱的相对性和对客观真理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他设法应付一切变化发生“在人性的一致性中”的唯心主义的假定。他指出历史学家必须研究的种种特点^②：“在贯穿所有个人的过程的一致性的基础上，个性、各种个性间分化的各个层次、各种姻亲关系、各种类型等等形成了，所有这些构成比较心理学的对象。”^③

确信“一致[是]个性化的基础”^④的狄尔泰，把各个伟大的文化时期看作为某种不变的东西的各种短暂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数个世纪中，各个个人的同类本质扩散到它的各个不同方面。按照狄尔泰的观点，在每个人中最初发现的东西以提高的形式显露在表现“整个时代的文化素质”^⑤的“代表人物”身上：“各个人种、民族、社会、阶级、职业形式、历史阶段——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一致的人性之内划分各种区别”^⑥，因为一致的人性在每一个时代具有一种特殊的表现。

以这种方式构想人的本质的含糊性是显而易见的。狄尔泰的形而上学提高到（从心理学上解释的）“生命”实体的（有区别的）各个方面的层次，实际上，这些方面就是极其不同的、自然的、社会经济的以及一般历史的情况，而这种境况同一个时代的“文化系统”的灿烂星群相联结的。

① 狄尔泰，《全集》，第7卷，第290页。

② 同上书，第5卷，第235页。

③ 同上书，第241页。

④ 同上书，第263页。

⑤ 同上书，第236页。

⑥ 同上。

如何解释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且不提这种统一性，依赖于每每表现整个人性的一个方面的心灵结构是困难的。（同黑格尔形成对照，狄尔泰不必要把这样一些现象评价为进步的征兆）。考虑到历史的明显对抗过程，谨慎地论及这样一种极其脆弱的总体是可取的。进一步说，在按社会组织起来的人们的相互作用的所有阶段上，这个历史过程把他们同人的和非人的外部自然界连结起来了。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的和对于“知性心理学”可以达到“纯粹的”人的本质是根本不存在的。用霍克海默的话说，在“统一的普遍人性的心灵生活”^①的基础上，既不能理解一个特殊的时期也不能理解连续的各个阶段。按照霍克海默所说，“当历史被按照在社会……的生活过程进行于其中的不同模式划分时，各种基本的范畴是经济学的，而不是心理学的”^②。

3. 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它的“世界史”概念把自己同资产阶级的历史编纂学区分开来。然而，一些传统的教科书把世界史和通史——两个常被杂乱使用的术语——理解为“努力达到自人类文化开始以来的全部历史过程的总体观”^③，而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这个概念有另外的理论涵义。

下述这个评论像它是独立存在的一样简明，发表在1857年

① 马克思·霍克海默，《历史与心理学》，载《批判的评论》，第1卷，法兰克福，美国河畔，1968年，第29页。也参见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45页，关于对唯心主义人类学信仰的批判：“人们的一切关系都只能从人的观念、想象的人、人的本质、‘人’中引伸出来”。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沃尔夫冈·莫姆森，《通史》，载《非蒂尔的百科全书第21卷—历史》，法兰克福，美国河畔，1961年，第328页。对许多著作家来说，莫姆森的解说是典型的。关于马克思，他写道，“尽管甚至通过黑格尔，马克思按照一种先验的即暴力建构历史，但他的理论在完全新的道路指导通史思考”。这些道路在什么地方，莫姆森没有详细阐述。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①对马克思来说，“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②。这是至关重要的。在19世纪50年代，当他把注意力转向极其庞大的社会历史材料（并这样开始《资本论》的最初工作时，他于是认识到，对前后相继的各历史阶级用刻板的直线图式是无用的。马克思不仅论及“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而且论及“在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③中，他所面临的显著的不平衡和分裂。例如，马克思探问，一个人如何去说明被看作为法定关系的现代生产关系仍留在本身也以完全不同的经济为前提条件的罗马法的范围内这个事实，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是一个导致马克思关注复杂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辩证法问题。他从这一时期起的著作证明他一直在关心这个问题。

马克思广泛的历史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是他洞察到与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成”和“生存”一起发生的历史的根本历史意义。这些研究（在今天这始终不被人们所认识）构成（并在所属的范围内）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素材基础。各个个人从前资产阶级的集团和共同体的自然状况中形成，并生活在这种创造的而不是给定的各种关系联结中所达致的范围，也就是历史变为世界史的范围：

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页。

^② 同上书，第47页。

^③ 同上。

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摧毁一切……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①

如果马克思仅仅满足于庆贺资本的划时代的解放作用的话，那末他将不可能成为像他这样的辩证法思想家。的确，当马克思论及在现代世界中发展起来的宝贵财富的人的内在本质时，他从不忘记强调它的“**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②，并坚持认为超越这种形式的必然性。在《大纲》中，当他回顾《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心论题时，他强调指出，在现存的关系下，“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③。

如此独特的肯定变为否定，不只是存在于人们意识中的一种现象。更确切地说，它是在“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④的增长中日益扩大和重复的一个现实过程。这个过程的必然性是历史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上，第393页。着重号是原有的。这是马克思再次采用他早期著作，尤其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的一些重要主题。

② 同上书，第480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0页。

而不是绝对的。只有当活劳动以其直接形式不再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出现时，只是

“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①

这些是清楚勾划马克思的历史思想特别是历史哲学方面的详细阐述。根据这些阐述，马克思旨于整体的统一性是明显的（避免结构主义者某些狭隘的科学观点）。从马克思最早期的著作到最成熟的著作，一直由“自由的社会个人”^②的思想所决定，这一种思想不能在直接取自任何单门学科的学术标准的基础上简单地加以评估，而应该理解为某种会合**社会**财富的发展所传递的东西。

因为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内容，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般人的理想可以不成为空话，可作为所有个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④的结果而变为现实。对于马克思来说，被解放的财富概念意味着“全面的发展”会提高到“目的本身”，它不能屈从于“旧有的尺度”。根据他的观点，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361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④ 同上。

放了的人性并不渴望“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①。

在1844年，马克思就已指出：“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② 马克思在这里概述了他的革命人道主义的唯物主义基础。通过有局限性的工具理性同它的“理性形式”相对照，通过“现存实在”同“真实实在”相对照，马克思强调的是从对现状的唯物主义的分析中推导未来的样子的必要性，而不是企图以种种纯粹思维构想推导未来的必要性。这恰恰是《大纲》的决定性的主题。正如马克思写道：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③

在《资本论》第3卷中，在论述世界史的“自由王国”的基础的著名段落中，马克思的评论同上述观点相一致。

这些段落应该使人明白，历史哲学仅仅构成马克思的历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20页。

思想的一个方面，尽管是必不可少的方面。它更多的是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冲动，这种冲动为马克思乐意接受。并且是从实质性的研究中产生的，而不是从一种抽象理论的发展图式中产生的。在著名的（后来被作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地谈到作为他的研究的“指导原则”的理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1877年，马克思认为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被迫捍卫他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②（参考《资本论》第1卷第24章），反对一位俄国作者把这个概述改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③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样一种对历史的“普遍答案”是错误的。他写道：“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④ 作为历史理论家或政治家的马克思并没有哄骗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他既具备智力上的博大精深，这使他摆脱表而叙述，又兼备尊重事实，它们只是在理论上作为事实本身常常首先被确定下来。

现在，我已在唯物史方面提供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领域的粗浅轮廓。这个领域，用德罗伊森的术语说（在细节上已作必要修正），首先包含着一种方法学，即一系列关于历史哲学的、历史理论的、历史编纂学的、甚至政治学的各门类的思考。因为在这些客观上受制约的观察历史的方式之间划分的界限仅仅是相对的，不能随之说我们可以忽视它们的区别。对于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46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书，第347页。

个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适用的东西,也适用于历史方法及其结构,就是说,它既不是无区别的统一^①,也不是孤立无关的各门学科的总和。

为了防止这种可能的误解,应该记住,我的这部著作的意图纯粹是学术性的、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我们时代的)一些实质性问题。相反,我认为,在阐明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的概念方面,我能普遍注视各种复杂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当代意义我在开始时就强调了。就此而论,像青年卢卡奇表述它一样,我要对将现代理解为历史作出贡献。

鉴于本书首先涉及到的对象,因而德罗伊森(他与狄尔泰不同,确实不是一位结构主义历史思想的先驱)本已将它归诸于历史的“系统的”和“论题的”领域。但是,由于本书的论战任务,所以引言部分相对地广泛涉及到的是唯物史,而不是正史的各种问题。

巴尔特(Barthes)在1966年推测,在未来,“结构主义的主要抵抗”将可能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方面,这种抵抗会“集中于历史概念而不是结构概念”^②根据讨论的情况,特别根据在法国的情况,证实巴尔特是正确的。而马克思的解释者们迄今宣称,这两个概念存在于“辩证的统一”之中(讨论通常是在“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的关系”的标题下进行的),这种常常只是一般化的论断已不再需要。结构主义思想从语言学转移到各门社会科学,然后在那里证明是恰当的范围,也就是在马克

^① 在马克思主义衰落时期,它僵化成一种使其内容失去光泽的封闭的意识形态,在概念上未经证实的从一种论证阶段向另一种论证阶段“过渡”中,总是太明显地显示出来。

^② 罗兰·巴尔特:《结构主义的滥用》,载《火车时刻表5》,法兰克福,美国河畔,1966年,第190页。

思主义中，首先是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中进行重要的再思考的范围：历史(历时性)和结构(同时性)相互远离。至少，它们的迄今仅仅是所谓的统一性变为有争议的问题。这样，马克思的《资本论》发展为以阿尔都塞和他的学生为一方，以著名的著作家如萨特、列斐伏尔和伽罗第为另一方之间炽烈争论的中心。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着这场讨论，本书联接着这场仍未完结的讨论。当阿尔都塞学派的代表人物批判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解释时，他们首先想到了葛兰西。他们拒斥葛兰西关于哲学理论同历史和历史著作同一的观点，正如他们自己把《资本论》当作同“具体历史”^①直接矛盾的“纯粹理论著作”一样强烈。本书权衡葛兰西和阿尔都塞各自见解的是非。而且，它阐明以唯物主义地接受黑格尔为背景的成熟期马克思的一些著作。结果，黑格尔主义“体系”，同它对历史过程的复杂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起的，而在以前未充分说明的作用，现在将变得清晰明了。就允许我们摆脱无历史的可知结构和无结构的不可知历史的循环论证而言，求援于黑格尔是必不可少的。

本书的各部分是1970年1月在海德堡大学和1971年6月在乌尔姆环境规划学院、蒂宾根大学和科隆艺术理论讨论会上所作的讲演。我感谢讨论的参与者提出的各种批评和建议。

1971年9月于法兰克福

^①阿尔都塞：《我们应该怎样读〈资本论〉？》，载《人道主义》，1969年3月21日，第3页。（没有出版的日期和地点）

历史和结构

科学是历史活动的自觉产物

鉴于最近有些人力图缩小或者甚至否定历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中的作用^①，因此，必须回顾他们在世界史方面的每个发展阶段上所考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对马克思后来的思想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书，包含着一个其重要性不会被强调过分的命题：“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②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离开这个观点。新的科学，一般来说，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产物，尤其是思辨唯心主义崩溃的产物，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历史“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

① 这个问题可见我的论文《对历史的结构主义抨击》，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论文集》，法兰克福，莱茵河畔，1969年，第194—265页。这篇反对阿尔都塞学派和列维—斯特劳斯与马克思解释的论文，特别批判了他们取消随问（视为人的实践的）历史一起的认识上主体性问题的趋向。有关这个问题为结构主义主题作文学上辩护的论点，在本书中将会更详细考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0页。

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①。现在，认识了它的“世俗基础”^②。这种对于历史的认识带来从意识形态的批判中获得的这样的见解，即先前认为是自律的“思想结构”，实际上是脱离和疏远物质实践要素的，因此，“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③。现实的社会关系形成这些思想结构。

过后不久，辩证唯物主义的奠基人从政治组织的透视，回归到新科学同历史的关系上来。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证道，文学上的无产阶级典型是以偏执的空想家出现还是以真正的革命者出现，这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的。他说，只要工人阶级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的缘故还没有从政治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即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④，因而它的辩护者们就会“想出各种各样的体系……并在他们的头脑里找寻科学”。对比之下，关于这种先进的社会关系方面，批评家们只得“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就行了。”到开始理解现存关系的否定的“破坏的一面”时，这些“由历史运动产生”的批评家们的科学，已“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9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6页。

⑤ 同上书，第157—158页。关于批判的无产阶级文学典型对世界历史过程同它的经济学上的阶级的内驱力之间的关系的一些令人注目的描述，是以两次资产阶级所发动的反封建的解放斗争的模式为基础的。在他的1847年写的针对卡尔·海因岑的论成论文《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2—356页马克思关于那场斗争写道：“著作家可以献身对这个历史运动，成为它的表现者，但是，不言而喻，他不能创造运动。……相反资产阶级著作家在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进行斗争的时期提出的原则性理论无非是实际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同时可以精确地看出，这种理论上的表现其所处实际运动的阶段的不同，而反映出

马克思这位成熟的经济学家写道，以为是在先验原则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①中引导出科学，这没有根据。对作为沉积的和仍在形成历史的现代关心，构成为革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它渗透于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它作详细解释而起步的一部著作。正如马克思所写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②。马克思对同时运用结构分析方法和历史方法的辩证法极为重视。用他的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③。

当然，这些既熟悉又不可或缺的思想，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困难，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充分意识到的。由于这些思想同当代的关联性，因此它们将被更详细地讨论。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成”和“存在”

根据新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应该理解为“历史活动的自

空想主义的、教条主义的、学理主义的程度也往往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52—353页。的确，对马克思来说，作为一种无产阶级解放的模式，资产阶级解放模式的特征，不仅涉及到它的方法和方向，而且也涉及到它的目标，从法国大革命到巴黎公社，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来说都至关重要，但他的理论却未充分注意这个政治上极为重要的事实：即甚至在1789年以前，法国资产阶级掌握了生产工具，而按照马克思的看法，直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设想无产阶级方才占有它。

① 《马克思致约·巴·施韦泽（1865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62页。也可见经常引证的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他在那里写道，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1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序，《资本论》，第1卷，第24页。

竟产物”的思想。它全然不追求在新的科学中认识同其对象的历史编纂学的简单符合。用当代结构主义者的话来说，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到马库塞的《理性和革命》的这种“历史主义的”解释，由于它指出了区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决定性要素，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的文献中，能起一种相当重要的作用。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实在是个过程，即“否定的”总体性。在黑格尔主义中，这个过程以理性的体系即以封闭的本体论出现，由此人类史降为是它的派生物，降为只是它所运用的一个实例。对比之下，马克思则强调历史发展过程的独立性和开放性，而它不能归结为一种所有存在物都必须永远服从的思辨逻辑。因此，在“总体性”意指整个现代生产关系时，“否定性”终于涉及到某种有时限的东西。特别在《大纲》即《资本论》的“草稿”中，马克思以具体的历史方法推演出这些生产关系。他写道，它们“不是从**无**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①。然而，它一旦形成了，那末资产阶级的条件就构成一个能够由自身加以说明的制度。马克思写道，用黑格尔的范畴来说，“资本生成的条件”过渡为“**资本存在的结果**”^②。当然，这个制度固有的表现有它的局限，因为一旦严格实施的话，它立即会拒斥“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③。反过来，这种分析会导至“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④。在这里，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同上书，第457页。

③ 同上书，第458页。

④ 同上。

克思胜过黑格尔。

因此，在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①的范围内，也就在这个范围内从逻辑的东西到历史的东西的过渡，同样涉及现在的过去和未来的发展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历史在这里起作用的方式：不是作为内容丰富的可叙述的历史，而是作为被构成的概念。前者构成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不可缺少的视界，但决不是在任何意义上构成这种研究的主题^②。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一种方法论上基本观点，它分析资本和“资本生成的史前阶级”^③，认为后者虽处于资本彼岸，但仍然依靠资本本身得到保护和增长。因此，对于马克思来说，“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④。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竭力强调认识过程对它的客体具有相对自主性这一特点，因此，不会简单地再现这个客体的历史过程：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7页。

② 由于巴黎的阿尔都塞学派的代表人物坚持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实际对象避免了抽象的理论经济学和一种具体的历史概念之间(主宰了以往争论的)对立，因此他们同意这个观点。普兰查斯写道，从直接意义上说，《资本论》“既不是一部‘经济学的’，也不是一部‘历史的’著作。毋宁说，它是一部把历史的概念和经济学的概念置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之中的，允许理论上建构历史和经济学主题的著作。……把经济学限定在一个理论上特定的结构范围内，为此，人们发展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一些形态变化过程的概念。”《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100年》，法兰克福，莱茵河畔，1968年，第68页。关于这个问题以及一般关于成熟期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释，参见阿尔都塞学派的研究作品：《马克思》“又不是一种历史主义”，载《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的〈谈〈资本论〉〉》，伦敦，1970年，第119—14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7页。

④ 同上书，第458页。

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人们已经把这些形式看成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①

逻辑的东西对历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

认识的主观的和客观的起点，如像一个事物的观念中介与实际历史一样，彼此间没有什么同一的。在这方面，马克思遵循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方法，后者已经谈到：“只有他的结果同他自觉的开端处于直接的矛盾之中的人，方是一个真正的创始思想家。”^②这种表述不过是肤浅的，因而是暂时的和“超常的”真理。这样，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不是（像人起先期望的那样）开始于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史，而是开始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③这一直接给定的日常事实。从商品抽象化出发，这种分析把它的一些重要形式上升到各种具体范畴：交换、货币、商品流通，最后是资本。只是在后来，马克思才论及实际的劳动过程本身，即一个暂时先于在范畴中表述的实际情况的过程。事实上，在《资本论》第1卷第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2页。

^② 费尔巴哈：《说明我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的片断》（1843/1844），载《全集》（斯图加特，1903—1911年），第2卷，第39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页。

24章中，马克思才首次处理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材料，在那里，在“所谓原始积累”的标题下，而且“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①，表现为“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②。

要是马克思没有首先在理论上把握资本的本质，他就不会在展开资本形成的一些历史前提的内容方面取得成功。他甚至将不会知道它们该在哪里和怎样被发现。因此，按照诸如M·M·罗森塔尔这样一些译注者的说法，认为论述原始积累这一章“仅仅具有运用实际历史证实和阐明由逻辑揭示的资本起源的目的”^③。初听起来这可能是令人惊异的，成年马克思把资本的历史置于科学基础之上，是在抽象理论的层次上而不是在历史编纂学的层次上进行的。由于马克思严格遵循资本的逻辑，由此不顾干扰这种逻辑和对逻辑而言是如此非本质的各种事件经验过程的所有因素，同他要是满足于在年代学上追踪直接眼前的发展相比，则他更靠拢经验史的历史内容。谁研究唯物辩证法，谁就会面对这个矛盾：一方面它的奠基人不允许他们受到现实历史过程变迁的深刻影响——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最初研究“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④——但在另一方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② 同上。

③ M·M·罗森塔尔：《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方法》，柏林，1969年，第473页。关于《资本论》的“逻辑方法”整个问题的论述，请见同上书，第165—484页。有关范畴叙述问题，由赫尔穆特·赖歇尔特在他的重要研究著作中进一步论及，参见《论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逻辑结构》，法兰克福，美国柯坪，1970年，尤其是请见第126—15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83页。

面，他们在他们分析的一切阶段不言而喻地假定“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历史上产生自“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①。由于没有放弃唯物主义基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所有概念的运用，直接或间接地，是建立在感性的、即物质世界的运动之上的），他们的理论思维具有一种“建构的”特征。它以集中的形式包容历史，而不是包容它的直接摹本^②。

强调上述一点尤其重要，这鉴于这个事实：即恩格斯——意欲使读者大众意识到马克思方法的新质因素——在他著名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评中不得不更多强调在唯物主义内部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之间的统一，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写道，由马克思首创的“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③。恩格斯继续说，如果没有黑格尔的“巨大的历史感”^④，这种历史观也会是不可思议的了。而黑格尔是尝试“把一门科学在其固有的内部联系中来说明”^⑤的第一位思想家，一个专心于历史过程的内部联系的哲人。在这里，比起或者是按照原本的基础进行辩护，或者是认为有必要为避免庸俗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的理论关注来，恩格斯更多强调在“思想的发展”与“世界历史的发展”^⑥之间照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3页。

② 在这方面，如同其它方面一样，马克思主义多亏黑格尔哲学，尤其是在《精神现象学》中常常讨论的一节“自我意识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它（同整个德国唯心主义一起）被正确地解释为是法国大革命的一种思辨理论，即解释为一个将它的世界历史的精髓概念化的企图，一项不意指写它的历史的任务。像在《资本论》中一样，《精神现象学》的序列在任何地方均不离开历史基础。但它并不因此描述在实在与精神之间一种贫串的平行现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26页。

④ 同上书，第531页。

⑤ 同上书，第529页。

⑥ 同上书，第531页。

格尔—马克思的并行现象。

恩格斯着重指出，马克思是多么渴望把呈现在黑格尔那里的认识过程的“抽象的、歪曲了的”方式，建立在一种新的、即唯物主义的方法上。恩格斯写道，马克思是通过把这过程建立在“历史中”^①实现的。问题是应该使辩证法具有科学上有用的形式，即使辩证法处在思辨的[黑格尔主义]的观点中，它“轻而易举地就结束了过去的全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②。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方法，无论从逻辑方面，或者从历史方面，都可强调辩证法的作用。马克思对他的材料选择一种“逻辑的研究方式”^③，不是为了用理论上不必要的次要材料揭示它的内在联系，但是，恩格斯继续说，只是在意义上，逻辑的方法有别于历史的方法。两者彼此相互交映。逻辑的(理论的，或者也如马克思所说，分析的)方式

“实际上……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④

从抽象意义上说，唯物主义哲学需要一直接触客观实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532页。

④ 同上书，第532—533页。

——它具有它的自我运动——并且它的一些范畴也不表现无时间的本质(本体论的结构),而相反“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①,这是正确的。甚至这些最抽象的范畴——马克思在与“劳动”相联系中,有力地指明这一点——只是在一些特定的关系方面是有效的。恩格斯也从不疲于强调,看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相互一致并形成一种统一,实际上这是以历史的东西为基础的:“只有历史的东西赋予抽象一定的形式,并前定它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②。恩格斯的评论也谈到在一些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大量说明性的历史的例证、解说和插页。通过常常把逻辑性回归到现实具体的历史中,它们既中断又证实了说明的逻辑性。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是确凿可靠的历史学家(以及他们时代的重要的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权威人士)。正如他们专注于当时的政治史一样,他们同样专注于有关经济史和社会史的一些问题(即借助他们的唯物主义方法首先严格地被当作论题的一些问题),更不用说首先在经济科学领域中他们有关历史文献的翔实知识和缜密见解。人们会想到,他们论1848年革命的一些著作,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剩余价值理论》。在这些论著中,用恩格斯的话说,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③。在它们那里,时间的顺序和思想的顺序相互贯通。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3页。

② 罗森塔尔:《辩证方法》,第4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2页。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论方面,请见我的论文《论唯物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编纂学》,载《理论辑论:论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文集》,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7年,第103—129页。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转而以结构的方式关注有关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之间的关系就以另一种样子呈现出来。于是，逻辑与历史——这在马克思那里是明白的——彼此分离并只有经过充分中介才联系起来。当然，方法的统一性依然是可察觉到的：“历史内容”仍然构成（现在在特定的意义上作为历史著作的）按法律定向的思想过程的“现实基础”^①。这后一种观点是摆脱了唯命是从地“反映”事实材料。当新康德主义者朗格（Lange）在他论述劳动问题的著作中声称，马克思以“罕见的自由”驾驭经验材料，马克思肯定地接受这个思想并解释说：“他没有想到，这种‘材料中的自由运动’只不过是对于一种处理材料的方法——即辩证方法——的描述而已……”^②由此，从马克思十分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可推断出一见就令人惊讶的命题：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③

黑格尔的分析理性和辩证理性

逻辑的优先性应该在认识的意义上理解，并非似乎各种

^① 罗森塔尔，《辩证方法》，第469页。

^②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70年6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

范畴是以它们为中介的实在的存在基础。同样，一种构成科学对象的“叙述方法”，而在形式上有别于(在最广泛意义上经验的)“研究方法”^①的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来自黑格尔体系，这显而易见。毫无疑问，在作出这种区别时，马克思思索着黑格尔的关于(科学的)分析和(思辨的)辩证法之间关系的《自然哲学》的引导思考的论断：

“自然哲学在物理学使它达到的立脚点上接受物理学从经验中给它准备的材料，并把这种材料重新加以改造，而不把经验作为最终的证明，当成基础。因此物理学必须帮助哲学工作，以便哲学能把提供给它的知性认识的普遍东西译成概念，因为哲学将指明这种普遍东西何以会作为一个内在必然的整体，从概念中产生出来。哲学的阐述方式不是随意任性，在人们长久用腿走路以后，也想有朝一日用头来行走，……物理学的方式不能使概念满足，所以才要继续前进。”^②

优于各个别领域归纳研究的“知性”活动对一个结构整体进行“理性的”叙述的，是适合于它的各种范畴结构——用黑格尔的话说，“普遍的思维规定的范围，好比是透亮的网，我们把全部材料都放在里面，从而才能使人理解”^③。推进到各种抽象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②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4—15页。关于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区别，请见我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概念》，载《当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4—36页。

③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页。

的普遍性并对它们心满意足的思考则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不能贯串于规定的内容中。按照黑格尔所说，它仍然是“分得支离破碎，各各孤立，没有其自身的必然联系”^①。因此，同它自己的主张相反，分析的知识仍然是一种“抽象的”，并因此是有局限的经验主义。对黑格尔而言，把只是整理感性材料置于对它们的思考之上，构成为一种“错误的方法”。而且，“直观也必须进行思维，通过思维将那堆零碎的东西还原成单纯的普遍性。这种思维的统一性，就是概念，概念具有特定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是一种在内部自己运动的统一”^②。

从抽象的东西上升到具体的 东西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基础上采用从抽象的东西上升到具体的东西的黑格尔主义的方法，因此也吸取黑格尔对无概念的经验主义批判的思想。对马克思和黑格尔来说，科学知识具有一种“叙述的”特征而不是一种描述的特征。它所指的“具体的东西”，同用(分类的个别事实)这个术语的常识含意所指的东西恰恰相反，取而代之是关于一种概念化的“多样性的统一”^③的综合知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反对(黑格尔主义的辩证法也

① 黑格尔：《自然哲学》，第15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我已经有意识地引用马克思熟悉的一部作品，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虽然它有抽象性，如今它仍受到极大关注，尤其是它的关于方法论的设计。自从圣西门的“物理主义”产生以来，新现代社会学人都一直被定位在自然科学模式上而论，黑格尔对物理学中分析的理性与辩证的理性之间有质的区别的解释，可为现代研究的宗旨服务。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一样)事实与观念之间的严格的二分法。它不是“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①。确切地说,它使普遍的社会生产应该把握为具体普遍的东西理论化了。诸如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一些特定的构成要素并非是以外在于它们的方式被组织起来的僵死材料的浑沌总合。相反地,照马克思所说,他们构成客观的“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②。而这是由生产的延伸要素所确立的。

与这个论断相一致,马克思鲜明地拒斥古典经济学只用“分析的方法”,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形式”,而取而代之相信它能直接完全地把这些形式归于统一。马克思认为,它坚持这个观点,是由于它教条地“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③。马克思毫不怀疑,分析的思维是“说明起源,理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要前提”^④必要的基础。但由于这个过程——认识的实际对象——并非直接地同历史的实际过程相一致,分析最多能(如在17世纪经济科学开初阶段所表明的那样)“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⑤。如按这种方式叙述了,它们依然是一个整体的各个孤立的要素,生动的整体的结构实际上不能从它本身的概念的必然性中推断出来。

然而,这些从历史中产生并通过分析得到发展的范畴,“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⑥并失去了它们的经验起源的痕迹的程度,

① 《马克思致恩格斯(1861年12月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页。

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下,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56页。

④ 同上。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⑥ 同上。

也就是经济学家们采用另一种方法所达致的程度。如今他们的体系开始从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复杂的东西，他们从劳动和分工，从需要和交换价值转向国家，国家间(政治)的交往和世界市场^①。对马克思来说，这种转变构成为“科学上正确的方法”^②。这种方法起初决不是(连马库塞也这样说，从至今讨论的情况来看，至少是属于误解)一种“历史方法”^③，不过，它的确以概念总括的形式包含着作为科学(并作为经验实在)的政治经济学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一个逻辑过程。这个过程以“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为出发点，并借助一些更为抽象的步骤，达到了“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④。方法的辩证结构呈现出它对“虚假的”和“真实的”各种要素，即对早期经济学在历史上走过的历程，沿着这个历程“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以及对晚期经济学的演绎行程，在此“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⑤，给予同样的关注。

在这方面，马克思也解释他与黑格尔的关系。同感性事实的积存相对照，逻辑的作用是使更具体和内容更丰富的知识成为可能的观点，接近于黑格尔的：

“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② 同上。

③ 赫伯特·马库塞：《理性与革命》，波士顿，1960年，第314—3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第38页。

⑤ 同上。

过程。”^①

当然，这种知识同被认识的事物的实际发生的非同一性，不仅显示出基本的唯物主义态势，即“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总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②。这些概念确实揭示这种本质，但不是（作为“这个”概念的要素）创造它。知识同它的对象的非同一性针对某种更为特殊的东西，即，尽管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方法，但它接受后者对经验主义的非常复杂的批判，是在它（正如我在这部书中曾反复强调的）与极大多数解释中呈现的自律性相比，给予实际理论过程的自律性要大得多。

在思辨的辩证法中的“研究”与“叙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关于“研究”与“叙述”方法之间的统一与区别的一些意见，即在他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所被严格贯彻的一些意见，这在黑格尔那里曾有它们的恰当模式。黑格尔对（在各个别学科中的）经验主义和具体历史为一方，哲学理论为另一方的这两者之间关系大量思考，是遍布于他的整个著作中的。现在我将讨论，可惜是相当泛泛地，出自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一个有关弗芝西斯·培根的段落。尽管它具有思辨的语言，但特别清楚地预想到马克思的一种“辩证的叙述”的设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② 同上书，第39页。

经验并不是单纯的看、听、摸等等，并非只是对于个别事物的知觉，主要是由此出发，找出类、共相、规律来。经验找出了这些东西，就碰到了概念的领域；它……为概念准备下经验材料，然后概念才能安安稳稳地采用这份材料。

当科学臻于完备时，理念就必定从自身出发，科学就不再从经验材料开始了；但是为了使科学臻于完备、取得存在，必须经过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过程，必须采取主动的行动，反作用于经验的东西、给予的材料，对它进行加工改造……没有经验科学的自觉发展，哲学就不能前进一步，超过古代人。理念本身的全体，是完备的科学；完备科学的开端和发生进程，则是另一个东西。科学的这个发生进程之不同于科学本身（完备的科学）的进程，正如哲学的历史进程不同于哲学本身的进程一样。在任何一门科学里，都是从公理开始的，这些公理当初都是特殊事物的结果；等到科学完备了，就从公理开始了。哲学上的情形也是一样；经验方面的发展是理念的很重要的条件，随着经验的发展，理念才能得到发展，得到规定。……后来这种哲学在意识中采取过河拆桥的态度；它显得只是自由地沉潜于它们自己的那种元气中，毫无阻力地在这种介质中发显着，没有什么反作用；可是，要获得这种元气，赢得这种在元气中的发展，却是另外一回事。”^①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1页。

让我们反思一下对马克思的科学概念曾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黑格尔的这些思想。首先，大唯心主义者黑格尔，决不会傲慢地漠视培根的有条不紊地认识各个别事实的原则，反而认为它是必要的，对思辨哲学本身而言则更是如此，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他看来，确定的东西构成不确定的东西，正如后者构成前者一样。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根本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一切经验都包含各种“理论的”元素，因此一种纯粹的直接性是不可能的。黑格尔接受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得到发展的各门科学，因为“依据绝对的知识”，如果它不打算主张空洞的理论，就需要广泛地和尽力地发挥“内容的特殊性”^①。后一方面则应由各种具体的研究来提供。它们用必不可少的事实基础提供给脑力劳动。然而，“经验”不止步于只是堆积感性的给予物，而更旨在把握客观规律的程度。如黑格尔所言，也就是它已经发觉自己“在概念的领域内”^②并为概念准备材料的程度。因此，在黑格尔那里（在马克思那里也一样）在现代的分析科学与辩证科学之间根本不存在不可沟通的裂缝。

从这些探索中产生的第二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或许甚至更为重要。黑格尔着重指出，科学（如他理解它那样：如“具体的”理念、“体系”），一旦是“完备的”，就必定不再从经验材料出发，而是从它自身出发。黑格尔以为，为了取得这种自律性，它必定依赖于“经验科学的自觉发展”。但至于哲学，其任务仅在于变为必不可少的。如果“理念本身的全体”^③借助经验的帮助达到了，那思辨的科学是完备的。可以说，它飘浮开它的现实基础，而且“开端的进程”被贬低为外在的、只不过是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0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同上。

抽象的“开端”。虽然正是这种失落和贬低显示出唯心主义的模糊性，但这并不接着应该简单地拒斥黑格尔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严谨地论及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它吸收了黑格尔主义的下列见解：即科学的“开端进程”必定不同于它的“本身的进程”，正像“哲学的历史进程不同于哲学本身的进程一样”^①。按照黑格尔所说，在每一门科学的开端，它都把自身定向于“特殊事物的结果”^②的公理。一旦展开了，这些公理就由它们自身的逻辑性所支配。但是，黑格尔暗示，这种脱离一切历史发展的“纯粹的”概念固有性的氛围，总是包含着一种虚幻的（马克思也许会说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同历史疏远的体系，但依然是要受历史制约的。

从“体系”到历史

现在我们转向马克思本人。仅就马克思不考虑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起源，也试图描述它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即一个自我说明的体系而言，他的理论追随着黑格尔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虽然这个体系是活生生的个人的自觉行为的直接成果，但它盲目粗暴地置身于反对它的创造者。因为，用经济学术语说，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首先在市场上的价值量中显示出来，价值交换“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这些价值量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③。因此，主要涉及客体的（往往被误解的）马克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第21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1页。

思理论的中心点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批判的理论，而不是一种世界观，也不是公开声明的教义。它的目标是：迄今无意识的支配力量，在未来应该从属于团结一致的人们的意识^①。

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它的准备工作，涉及到一种人类的造物同无情无义的自在物一起出现于此的状况。例如，马克思写道，在金钱的偶像崇拜中，“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②。理论不过是极其困难地使直接性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日常生活中它仍旧是难理解的）。人们之间像物一样凝固僵化的关系，由于人已被贬低为不过是为实现这些关系的载体与无声的工具，就形成一种本身也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特定对象的否定的总体。正如已经强调过的那样，马克思首先不是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来研究资本主义世界，而确切地说他是从它的已生成的结构的观点，即从已达到的“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的观点出发来研究的。他从近代资本发源的土地所有制史中进行抽象。如马克思写道，后者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其中“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也没有”^③。对马克思而言，充分发展的资本的一切历史的前提条件（他已经彻底研究的前提条件）只是“资本生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那些前提条件，而这是沿着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路线进行的。它们“属于资本的形成史，

^① 关于这一点，请见我的论文，《对历史的结构主义抨击》，它批判结构主义着作家们直接的“客观主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99页。

^③ 同上书，第205页。

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①。马克思是在严格的演绎意义上而不是以历史编纂学任务论及一个“体系”，因为体系所发展的资本的这种形式产生它自己的存在条件，并不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②。暂时先于它的各种形式处于体系彼岸，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③。

初看起来，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所不存在的，这种经验史和各种范畴^④的内在“叙述”之间的分离，违犯了在唯物主义文献中一直恰当强调的这个原理：历史的东西同逻辑的东西相互贯通。不过，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情况。正好像我在一开始所强调指出的，如或许初听起来是陌生的一样，同马克思满足于在直接并非因此是虚假的正确性中描述历史过程时相比，倘若他行走在逻辑—建构的道路上，则更接近于实际的历史过程。在《资本论》所证实的方法（类似黑格尔主义方法），不是外在于主体的一种工具，而确切地说是复制它必然的“自在进程。”它的目标在于把资本主义的进程当作一个整体，以使得它的客观逻辑，由于摆脱了偶然的和意识形态的附加物，而将变得昭然若揭。马克思本人用以下方式描述了他为自己所提出的任务的特点：“应该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要不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就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的说明。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6页。

② 同上书，第457页。

③ 同上。

④ 同只是历史资料的搜集与整理相对照，“总体性的事物……的……叙述”的质上高级的概念，原此未充分、展开的形式，但无疑已出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了。关于这个论点，也可参见我在《论唯物辩证法的历史与历史编纂学》，第122页。

同时是对上述体系的说明，并通过说明对它进行批判。”^①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这个双倍重要方面，引导我们从逻辑问题返回到历史—理论问题。

我们从马克思故意忽视资本在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特殊性来分析资本的结构这一思想出发。他专注于它的生成的形式。当然，资本以货币的直接形式出现，对货币来说，劳动力可作为市场上的商品被买到。马克思考察了商品同货币之间的交换过程，于是指明后者变成资本的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解释，货币起源于流通之中，并且是“最初的概念……最初的表现形式”^②。如罗森塔尔的研究所着重指出的这种纯逻辑的分析同时构成马克思最初出于体系的缘由而忽视的“资本史的钥匙”^③。可是马克思间接地指出了资本生产方式必然以他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中真实地指出的内容为前提条件：即“一方面是货币所有者”，而“另一方而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④，彼此处在对立地位。此外，正如罗森塔尔又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蕴涵着历史同每一个资本增殖的新举动一起重演自身。罗森塔尔写道，“逻辑分析”的范围，“同时是历史分析”的范围。“后者仅作为前者的对立面出现”^⑤。换言之，虽然以一个充分中介的方式，但逻辑的东西历史的东西相一致。

货币如何变为资本，首先是一个历史问题。马克思忆及近代社会是在16世纪与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一起形成的。建立在土地所有制上的统治与奴役的个人关系，通过资本的匿名的力

① 《马克思致斐·拉萨尔(1858年2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6页。

③ 罗森塔尔：《辩证方法》，第472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782页。

⑤ 罗森塔尔：《辩证方法》，第472页。

量被瓦解了，而这种资本起初是作为货币(财产)以及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出现的：“G—W—W—G；即货币同商品交换和同货币交换；这种为卖而买的运动，即构成商业的形式规定的运动，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这是以交换价值本身为内容的最初的运动，交换价值在这种运动不仅是形式，而且是运动本身的内容。”^① 马克思的术语，贸易“形式的确定”(一个恰当表达他的科学兴趣特点的表达)，在理论上保证了以下一点：用他的话说：

“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②

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过渡的一般理论是不该从历史上，而相反在商品交换所固有的规律的基础上展开的。

这样一些论断同黑格尔著作中阐述的那些论断的平行不悖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一旦达到圆满成功，自我确定，就像蜕皮一样，把它的一些历史前提搁置一边。因此，以资本的货币形式出现的这种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构成一个其功能必须通过严谨的思想劳动得以解释的“在过程中”的体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6—207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67—168页。

科学的出发点问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试图实现一个困难的任务，例如一个将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价值形式作为他的出发点的任务。他称之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细胞形式”^①，一种有可能揭示它是一种“强化的”总体性的形式。像莱布尼兹的单子一样，商品本质上反映出受它的结构所制约的整个世界，列宁曾特别注意这一点。在他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他尤其是在认识论方面，考察了黑格尔的概念理论，并由此确定这一点：

“(抽象的)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看法、信念、意识。……作为一种简单的价值形式来说，其中就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即使是最简单的概括，……就已经意味着人对于世界的客观联系的认识是日益深刻的。”^②

而在另一处，他又提到在《资本论》中的理论进程：“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当做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两种分析：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的和历史的（价值形式）。”^③ 换句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②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89—190页。

③ 同上书，第337页。也可参见第13页。在那里，列宁强调“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构成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基本思想”。

话说，列宁继续谈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提供“资本主义的历史”，但正如他明确补充的那样，它是以“概述资本主义历史的那些概念的分析”^①的形式提供的。

这里，列宁在思考《资本论》第1卷的体系的结构，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起始于商品—货币—资本的顺序而言，一个历史的结构同时是一个逻辑的结构，反映出应该导致资本在西欧产生的实际进程。既然这个进程的前历史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表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逻辑开端就同它所研究的对象的发生的起点相吻合。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实际的历史从哪里开始，论证的路线也必定无疑从那里开始^②。但由此声称，因为《资本论》开始于商品分析，马克思需要描述现代社会的生成，那是不对的。正如我们知道的，理由明确是一种理论的理由。商品呈现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③，并且“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④。这是——在于——在黑格尔主义的意义上，概念上仍然是未定的和内容上贫乏的某种抽象的东西，通过极其巧妙的抽象，以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从此上升到更具体的、更分化的知识。结果，在由商品分析产生的各种范畴，资产阶级世界的客观对抗的洞察同它的崩溃的预示之间在那里存在一种发展—逻辑的联系。开端暗示的东西，由结局证实了。正如黑格尔写道，因为“离开端而前进，应当看作只不过是开端的进一步规

① 列宁：《哲学笔记》，第357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00页。

③ 《资本论》，第1卷，第47页。

④ 同上书，第99页。

定，所以开端的东西仍然是一切后继者的基础，并不因后继者而消灭。”虽然它逐渐变得越加被中介的，但哲学的开端是“在一切后继的发展中，都是当前现在的、自己保持的基础，是完全长留在以后规定的外部的东西。”^①

“进步—倒退的”方法

由此，必须考虑这种最初难以理解的情况，认识在主观方面的进步，对于它的内容而言，从客观方面看是一个退步。这里，马克思仿效黑格尔的《逻辑学》的结构（以及如列斐伏尔和萨特所指出的，它的“进步—倒退的”方法）。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探讨了这个问题，即哲学首先必定是一种“探求”，因为它只能开始于“以假设的和有问题的真”^②。他受到对“开端”的思辨问题所述的正明显发展的兴起极深印象，并利用这个机会主要达到了解“逻辑进步意义”，首先了解这个观点，“即在哲学中的向前迈步，反倒是一种回溯和找根据，通过这种回溯和

^① 黑格尔：《逻辑学》，纽约和伦敦，1969年，第71页。作为一个辩证法思想家，马克思对理论开端同时存在的直接性与间接性深思熟虑。这样做时，他明显地倾向于黑格尔的著名的一节：《必须用什么科学的开端？》（参见同上书，第67—78页）在这个题目上必须说的内容。深深地基于学理史，马克思清楚知道，他的商品分析的出发点（作为产生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具体活动和抽象活动的劳动）决不会只是从他的有意选择或者从他的研究对象的构成（和发生）起始。确切地说，它也起自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过程。后者的发展以下列方式进行：学者们（马克思在有关价值问题上提到重农学派）在能够获得对更进一步的工作所必要的初始评价之前，他们常常就先在一种更加复杂的形式探讨各种问题。总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正如一切科学的历史进程一样，在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之前，总要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室。”《马克思黑格斯全集》，第13卷，第47页。

^② 黑格尔：《逻辑学》，第7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找根据，才显出：那被用来开始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任意假定的东西，而事实上它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最初的真”^①。黑格尔详细阐述说明这个观点——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重要的观点——他说道：

“即：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就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实际上将是由根据产生的。……这个最后的东西，即根据，也是最初的东西所从它发生的那个东西，它首先作为直接的东西出现。……对于科学说来，重要的东西倒并不很在乎有一个纯粹的直接物作开端，而在乎科学的整体本身是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中，最初的也将是最后的东西，最后的也将是最初的东西。”^②

我们现将研究，这个重要的黑格尔主义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再现时所经受的各种修正。

按马克思看来，分析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始终，是由“实在和具体”^③规定的。在他的唯物主义方法的重要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于1857—1858）的导言中，马克思把“实在和具体”理解为他意欲从概念上分析的所有“直观和表象”的基础。它出现二次——作为认识过程的“起点”，和作为它的“结果”^④。在第一种情况，它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商品财富的完成了的直接性（对整个时代至关重要的商品结构，马克

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7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同上书，第70—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7页。

④ 同上书，第38页。

思则通过“显微镜下的^①各个别方面的分析加以阐明)。在后一种情况,“实在和具体”涉及到从智力上把握这些直接事实的全体,就是说,科学所求的它们的内在的、类似规律的联贯性。但是这种联贯性,和检验它的逻辑操作一样,不可能是“神秘的”^②。马克思就是因为这种神秘化而批判黑格尔主义哲学。既然“正在理解着的思维”不是“现实的人”,“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不]“是现实的世界”^③,第一种直接性,在习惯用语中被称之为“具体”的,同一旦在理论上受到渗透而证实自身是一种高级的具体恰好相合,不管理论渗透到具体之中是否成功,实在客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④。

实际认识过程的唯物辩证法在“起点”和“结果”之间发展;分别受到思考的这两者,是一些抽象的要素。考虑到辩证法这个历史—理论的方面,我们会再一次考察它。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认为理念从“未发展的、无内容的认识[到]有内容的认识,并且那才是真正有了根据的认识”^⑤的进步发展(它更接近于从“有”到作为概念变得完全可理解的“本质”的发展)。他把这看作为空洞的开端分阶段地回归到它的首先给予它充分内容的“根据”。成年马克思采用的也正是这个思想。他也仔细地研究了从经济实在的外在的表面“现象”到它们的“本质”(内在规律)的进步;就是说,他也回归到这些“现象”、“存在”的“根据”。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确信“开端的回溯的根据……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页。

② 同上书,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上,第38—39页。

④ 同上书,第39页。

⑤ 黑格尔,《逻辑学》,第72页。

开端的累进扩大的规定性”^①同时发生。无疑——这造就所有的差别性——黑格的各种逻辑范畴，一旦转换成政治经济学范畴，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首先，它们丧失了它们无时间的封闭的确凿性，因为以开端(给定的商品世界)为媒介和认识朝此运动的“根据”，不是一种绝对观念，而是敞开整个逻辑内在性并永不能被精神化的历史。

可是，马克思在从交换的经济形式(并不是从它的自然内容和历史内容)中推导出资本概念，竭力在它自身术语范围内完美地解释资产阶级生产的机制，他不准备在现存制度本身面前屈膝投降。的确，他写道，为了“揭示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②是多余的。但是，他继续写道，明显脱离了任何历史的东河的逻辑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对〕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③，是确切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4章中描述了过去，论及“原始积累”——本质的实际发展：那部著作的理论活动开始于(黑格尔主义的)“根据”。

资本主义在世界史中的位置

从方法论上说，资产阶级社会对辩证唯物主义而言极为重要，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

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8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

③ 同上。

织”^①。马克思强调，不论是恰如其分地理解过去，还是恰如其分地理解未来，都依赖于“对现代的正确理解”^②。按照马克思看来，对既定结构的批判的分析，“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③。丰富多采的发音清晰的系统是规定系统的历史能在此显示出来的基础，而不是相反。这个见解把辩证法同肤浅的进化论区别开来。在自然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在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④才能被理解。因此，尤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先于它的一些社会生活形式提供“钥匙”。对马克思来说，这不过是在把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它的先驱者之间的同一性时，强调必须不要忘记这种差别性。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的一些范畴（和通过它们得到表现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资产阶级时代之前：“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然而总是“有本质区别的”^⑤。于是马克思对历史发展概念又作了值得注意的反思：

“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在一种基本意义上〕，……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58页。

③ 同上书，第43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

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①

从世界史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标志着一个制高点。一旦呈现为一个功能系统，它在理论上可用作解释其过去以及未来发展的一条原则，并因此也可确切地解释潜藏在其系统性之下的那些推动力。当马克思在讨论货币转变成资本的方式时，他感到不得不补充说，“辩证法的叙述方式，只有在它认识到它的界限的时候，它方才是正确的”^②。这些是生动的历史渗入类似自然的、僵化的系统的突破点。资本的一般概念能用纯粹演绎的方式从“简单的流通”中推导出来，因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后者“本身只是资本底前提，而且是以资本为前提而存在着”^③。但这并未（如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的明显讽刺的评论那样）把资本改造成“永恒观念底化身”^④。确切地说，它显示出“资本怎么样在现实之中，仅仅作为一种必然的形式，……必然地达到以交换价值为根据的生产”^⑤。当然，关于从流通过渡到资本的规律性，当马克思以逻辑的方式，而不是以历史编纂学的方式描述它的历史性质，相当多的困难出现了。他写道：“简单的流通乃是资产阶级总生产过程底一个抽象的侧面；这个侧面通过它自己的规定，表明它单纯是停留在它背后、既是由它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44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五分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着重号是原有的。

生又是产生它的那更深一层的过程的抽象形式。”^① 货币通过交换非资本的东西，即个人的劳动能力而变为资本。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一个体系，同时又不是一个体系，因为形成资产阶级社会总体的东西同样就是不断驱赶它的东西。作为一个固有的批评家，他假定他考察的关系存在于“与它们的概念相一致的纯粹形式之中”。但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知道这种情况（不仅仅在那个时期的英国）是多么少。社会主义不能安心满足于低级的研究论稿，而它把自身看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②。当然，正如马克思总是承认的那样，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中”^③，找到了它的起点。马克思如此称赞李嘉图，是因为他与肤浅庸俗的经验主义经济学家们有重大不同之点，即他坦率地说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这种对抗性质。而且，马克思指出：在李嘉图研究自由竞争中，他至少足够尖锐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状况的暂时性的问题，他本人把这种状况视作为人类生活的一种无可争辩的自然形式。

竞争——这是它的否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方面——瓦解了自然而然地同前资产阶级各阶段相联系的集体性强制和限制。多亏对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及时观察到，在分析这个过程中为避免提出从其产生“自由的个性……的绝对存在形式”^④的持久错误，这是重要的。从多方面发展的竞争透视，作为早些时期的生产方式的界限出现的，对这些方式本身来说是“它们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五分册，第2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61页，第4页。

③ 同上。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8页。

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①。就是说，决不是实际的缺陷。马克思强调指出：

“只有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原则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决不是摧毁一切界限和一切限制（同资产阶级辩护士们今天仍然主张的相反），而只是摧毁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些界限。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②

有关资产阶级社会的既成“制度”的自由竞争方面，对马克思来说甚至更为重要。在自由竞争中，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③发生关系。“资本的内在规律”，“在资本发展的最初历史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预示的“倾向”。从现在起，“才确立为规律”，并在实际上照这样发挥作用。马克思继续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程的自由发展。”^④马克思反对过于乐观地解释竞争的作用。在他看来，它不是活生生的个人（及其需要）通过竞争得到解放，而是资本，同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8页。

② 同上书，第158—159页。

③ 同上书，第159页。

④ 同上。

竞争一起，开始了它的“现实发展”^①。在竞争的一般本性和概念中固有的东西，现在呈现为支配许多单个资本的“外在的必然性”^②。各单个资本的竞争（这包括工人同他或她的同伴的竞争）非常简单地意味着，它们通常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③。

只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是推进为人类服务的生产力的普遍增长的最适当的历史形式，那么伴随这种生产方式而来的意识形态就包含真理的要素。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必然地〕就表现为个人的自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④。竞争资本“相互之间施加的”“相互强制”，导致“作为资本的财富得到自由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发展”^⑤的范围，也就是竞争变为一个科学上和经济上重要范畴的范围。李嘉图甚至“以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些最适当的规律”^⑥，竞争的水平越高，这种努力将越加成功有效。正如所论证的那样，决定资本运动形式如何完全地显示自身的，正是前者。

于是，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由于坚定地坚持这些前提，不由自主地作出超越资产阶级视野的自白。客观上，出现在他的概念中的，是“资本的历史性和自由竞争的局限性，而自由竞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59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60页。关于（通常对马克思理论是重要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客观辩证法，也可参见《资本论》第1卷有关部分。此外也可见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第189节。在此黑格尔写道，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并调节着事物的理智。”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4页。

④ 同上书，第159页。

⑤ 同上。着重号是原有的。

⑥ 同上书，第16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恰恰只不过是各资本的自由运动，也就是说，是资本在下述条件下的运动，这些条件不属于已解体的先前任何阶段，而是资本本身的条件”^①。这类自由竞争正是在前个世纪的政治斗争中向纵深发展，那并不意味着资本关系是建立在许多资本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相反，竞争的前统治蕴涵着作为一种历史的生活形式的资本实际上已经确立自身，并仅仅出现在流通领域的一些表而事实中。尽管毫无结果，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还是提到这一点。尤其是，它不能使他们看到现存社会的非历史的“系统性”自身是在历史上产生的。最后，古典经济学家们陷入马克思在《资本论》关于商品拜物教性质的一节中称之为对象化的幻觉之中。马克思写道，这种幻觉被资本的运动所增强，“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只要它不再需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②。无疑，资产阶级世界的这种系统性证实自身是空前的脆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资本中，生产力的扩张（它曾经使资本的胜利成为可能）以及由此人类自由的扩大，起来反对一种限制，超越这种限制不能用这种制度固有的方式，而只能通过超越它的质的飞跃来实现。马克思的理论表明了下列大家熟悉的结论：即资本具有似乎完成它的统治的各种形式——日益发展的资本集中渐渐地弭息自由竞争——而事实上它宣告了它的失败。

马克思论证说，当自由主义，以它的古典形式和以它在当代的延伸，把计划经济中“否定自由竞争”等同于“否定个人自由”，它忽视了这个事实：即它的这种“个人自由同时也是……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同上。

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物”^①，并且这些社会条件使其自身独立于各个个人。对马克思来说，认识这些物是人类的历史产物，并对后者同它们的劳动的对象化的工具的分离谴责为一种应受指责的统治形式，是“一个了不起的觉悟”^②，而（自身从这些关系中成长的）理论，必须表达或者甚至首先确立这种觉悟。成年马克思方法的特点，（从至今一直讨论的内容中，有许多是清楚明白的）在于它服务沿着逻辑过程前进的历史辩证法的爆发力。超越现代的历史并不是作为他的世界观的一种外在的插入物进入他的体系。而（至少按照他的思想）是严格地从它自己的前提中衍生出来有关在资产阶级世界之前的过去，在论战中于《资本论》处处可见。因此，它们出现（在著名的第24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1页。

② 同上书，第469页。这个思想再次表明，由巴黎的阿尔都塞学派提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解释的一些局限。例如普兰查斯在它们的不同对象基础上于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内部区分出两门学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历史科学”——规定它的对象为“历史的结构”；前者——“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普兰查斯在知识论意义上所理解。它涉及到“知识生产，那就是思想进行过程的结构和功能”，并相当于“科学发生史的理论”。（普兰查斯：《权力和社会各阶级》，伦敦，1977年，第1页。）普兰查斯强调把唯物主义认识论归之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多么早熟的，当然是正确的。他拒绝这种“历史主义的解释”（在此他提到青年卢卡奇和柯尔施），在这两种解释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人类学，历史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初始和基本的范畴而不是被建构的概念，对各个结构的思考，‘获得它们含义的意识’，是结构本身的一种功能，它们是透过中介过程而深入内心的”。（同上）于是，提出了这个问题：普兰查斯（连同他老师阿尔都塞一起，想要铲除马克思主义中的所有黑格尔主义痕迹）是否因此陷入柯本人称呼为“实证主义——经验主义解释”的明显错误。这样一些解释把历史唯物主义缩小为一个普遍有效的“规律”（或“模式”）的毫无血肉的空壳，而它只让随附用一些历史实例使之“具体化”（同上）。否则一个人该如何来解释普兰查斯的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论及历史“概念”这个论题呢？这个概念（如其自己的名称承认，普兰查斯或许会承认的）难道不是对历史过程，或者尚对叙述前历史的史前之研究为前提于任何吗？无疑，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有“建构”历史，并且有在唯物主义意义上的伽达默尔的“实践”。为什么公理辩证法理论把两个概念放进无中介的（甚至是直接的）对立之中，如同在普兰查斯那里的情况那样，这很难理解。

之前)或者是没有直接地构成这种认识过程,或者是没有在“叙述逻辑”中找到它们的位置。

为把货币变为资本,它的拥有者必须市场上找到自由工人(现代无产阶级)。至于为什么货币拥有者在流通领域遇上这个工人的问题一点也不使他发生兴趣。在劳动力市场上,他十分正确地看到“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①。起初,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也一样不感兴趣,正如他所写的:“货币所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②换言之,马克思讨论了他的对象的有系统的前提条件,而没有在它们面前止步不前:

“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2页。

② 同上。

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①

上述段落强调了马克思的下列观点，即一旦资本已经生成及其形成的各种要素已经“消失”在允许固有的严格批判的体系之内，就不再需要揭示资本的发展史的起始点。这条辩证思维是绝对必要的原则，却需要—次校正，因为它所阐释的只不过是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关系的一个方面。如果有人记得从—开始马克思就研究斯密和李嘉图的成果和宗旨，这就可明白他的批判曾追求—种同他们所追求的性质不同的目标。他—次—次返回到在经验和知识范围之内的叙述必须让位历史的叙述的结节点，并非只是从对档案的兴趣出发的。而理由就在这种分析中。解释资产阶级制度同它的过去有关的这种分析，同样多地表明这种制度是同它所超越的“变易的运动”有关：“—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②

逻辑的方法，如果得到正确把握，对理解历史发展也是最适用的方法，再次——在对马克思的整个思想框架至关重要之点——变得显而易见了。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允许在“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③把握对抗的整体。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写的：“任何事物能达到最成熟时期，最高级阶段，也就是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2—193页。着重号是原有的。也可参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五分册，第2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滑坡的开始之时。”^①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现实，^②正是建立在这个见解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见解贯穿于他的每个个别论断之中。他知道，资本主义现实的现象的直接形式，对他的理论为洞察本质所提供的东西短缺到什么程度。尽管虚假的社会，在不可确定的时间内，可能增长许多，但它是一个世界精神的自我瓦解形态，即受世界史法庭谴责的形态。

在这些思考的背景上，我们现在能考察在成年马克思中的

^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611页。

^② 鉴于结构主义的解释，应该着重强调的是，连《资本论》（不顾它的专注于客观性的方法和作为这种方法产生的结果），都包含承担着整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这个思想，这关系到应该使已生成的和正生成的现存结构变得清晰可见。将结构与实践主体性联结起来。《历史和阶级意识》的不朽贡献可能已经有力地指出了这一点。因此，在卢卡奇的论文《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的未来建构尤其有启发性）中，他指出，黑格尔陷入种种困难，是因为绝对精神与历史（“世界精神”）之间关系仍未得到解释。由于扬弃现实史，黑格尔哲学达到一种无时间概念的发生，即既从实在中接收同时又否认实在的发生，一种从逻辑经自然到精神运动的发生：“但由于所有范畴及其运动的历史性明确地闯进辩证法之中，由于辩证的发生和历史客观上必然共生共长……这个曾一直被称之为是超历史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在一时刻展示一种历史结构。”（《历史和阶级意识》，剑桥，1971年，第147—148页）因此，黑格尔的方法具有“抽象思辨的”特征，一方面，它“伪造和违反历史”，另一方面“历史将进行它的报复并违反誓不将历史整合、把历史分割成碎片的方法。”因此（这里卢卡奇回忆起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精神”的造物主角色”将显示为纯粹的“概念神话学”（同上）。正如卢卡奇尖锐抨击（李凯尔特型的）近代历史理论家仍然是陷入事实的原始的直接性，当然，同从它们的丰富性中允许仅作一次“选择”的“价值”相联系的趋势，让事实性本身不作改变，并只不过是偶然地和外在地同它相对立（同上书，第151页）。从而，所达到的仅仅是“一种用种种历史事实作例证来显示历史和社会的正规的类型学”。（同上书，第154页。着重号是原有的），另一方面，卢卡奇想起的事是一种对历史上运动的存在的有效力的自我解释，即，不是从中立的、外在的观点来描述事件的客观实在性的一种理论，而是这些事件世界史的内容成为昭然若揭的一种理论。所以，他强调指出，辩证法实际上能成为一种“历史方法”，它依靠“能在其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在其自身之中揭示……行为主体，创世的‘我们’”（同上书，第149页）的无产阶级来发展，而这仅仅同马克思主义联结在一起。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础上，“无产阶级的历史知识开始于对现代的认识、对其社会处境的认识和对它的必然性（即它的起源）的解释。”（同上书，第159页）

系统与过程、逻辑与历史的复杂关系，并能在它的基本的方面作考察。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解释的 正确方面和不正确方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主张的，决不是一种不顾前后的历史主义。在此书中，认识的进展直接同事件的发生过程的顺序相平行。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的解释者，诸如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是正确的。在此之外，当他们断然否认黑格尔的逻辑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建构作用，并主张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①时，不相符就出现了。因为马克思的文本并没有提供支持这样一种解释的证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未像结构主义者曾声称的那样，由于本身是意识形态的，或者拒斥历史的主题或者拒斥人性的主题。相反，在后期马克思（如在1857—1858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最为明显），我们遇到再次援用黑格尔，尤其是黑格尔的《逻辑学》。这部作品对于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的政治——经济分析，如同取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劳动范畴，对于他在19世纪40年代的“自我理解”一样重要。当然，在《资本论》中，不存在独断地建立的人类学，也不存在抽象人道主义的、外在于科学

^① 参见阿尔都塞的论文，《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载《保卫马克思》，纽约，1970年，第279—317页。也可见普兰查斯在1967年9月法兰克福学术讨论会所作的报告，《理论的历史——关于《资本论》对象的短论》，并重新刊登在《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8—69页上。对这些阿尔都塞观点的批判，也可见沃尔夫·莱彭尼思和赫尔伯特·诺尔特的《人类学批判》，慕尼黑，1971年，第68页。

的认知过程的“人的映象”（在这一点上，人们能够同意结构主义者的观点）。但是，由此说马克思是一个“理论上反人道主义者”，将会是错误的。就在他致力于分析商品超出国民经济的常规水平而言，这显然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只是拒绝显示资本主义日常生活的物化的、伪客观的结构，而代之所寻求使凝结于结构中的历史恢复生气，尽管受到扭曲，他还得对付这种特定人类现实。因此，在他看来，连资本都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①。把人降低为只是“商品世界的承担者”^②，是一种否定的、已在历史上被超越的，而不是一种科学规范的状况。

尽管马克思对历史有无可否认的合理兴趣（这点使他与康德联系起来），在《资本论》中实际上未真正按历史过程进行论述，而宁可就教于黑格尔的《逻辑学》，旨于“一种综合科学、一个体系和系统认识的基础和可能性”^③。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发现这类知识由抽象到具体、由普遍到特殊有条不紊地进展。这两位辩证法思想家抵制了当时流行的感觉主义，这种感觉主义一般是通过把给予朴素意识的各种孤立的事实作为与“具体的东西”同义的，而屈从于它们。正是由于各个个人从感觉上比从严格的概念上把握世界更容易些，并不由此得出下列结论：从感觉上把握世界一开始就是“比从抽象的论题开始的东西，和同它的特殊化和具体个别化相反方向继续进行的过程更自然而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4页。关于马克思理论上努力的明显的人道主义方面，也可见我的研究：《〈社会研究杂志〉，历史与现实意义》，慕尼黑，1970年，第3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2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第801页。因此，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用黑格尔的理论。具体的东西是思想的抽象的各种规定性的“多方面的联系”。

然”^①，甚至，提出关于“更自然而然”的认识过程的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在科学思维中“要求一种适用于认识的方法”^②，为了达到精确性，这种方法允许暂时忽略对象的外在的起源。

现在我们要探讨的这些结果，起因于黑格尔的“适用于认识的方法”引入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特殊方式。对此我们必须再次转向被马克思所折射的同唯物主义史，或更确切地说，同他的辩证法历史地与非历史地同时进行的这种矛盾的联系。只要它把认识和真实事件看作是一个正在发展的整体的各个要素，它就在历史地进行。即正如卢卡奇所强调的，一方面，表明了“以之建构人类存在的所有范畴必须作为这个存在本身（而不仅仅是这个存在的描述）的决定因素出现”；而是另一方面，“所有范畴的连续、连贯和联结必须作为历史过程本身的各个部分表现出来”^③。相反，正如阿尔都塞所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非历史地或者以建构方式进行，是由于从现存的拥有一个总是前定的复杂结构的整体出发，反过来，它也使辩证法能规定赋予（与“结构的”因果性，而不是与“线性的”因果性^④有关的）所有“简单的”范畴的价值地位。

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提防由“第一哲学”所主张的抽象单纯性的抽象起始的神话，是正确的。但是这一点不能随之出现，阿尔都塞所假定的并由他只是通过任意地运用引文所完成的马

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891页。

② 同上。也可参见第588页。在那里，黑格尔以所期望的敏锐性陈述了在理性认识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历史思维之间的区别。结构主义者把他们抨击特别指向黑格尔或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全然是不慎重的。因为在许多地方迎合他们对历史主义批判的，正是《逻辑学》。

③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59页。

④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3页。这里，阿尔都塞使自己适应马克思的1857年的《导言》。

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彻底的非历史化。当然。马克思把生产(当作一个普通概念来叙述)总是看作为在历史上决定的“社会个人的生产”^①。阿尔都塞补充说,因此,这些人“生活在一个有结构的社会整体之中”^②。这用来支持阿尔都塞关于不可能科学反映顺序的论题,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事实。阿尔都塞写道:

“马克思排除了越过这一复杂整体再向上回溯的可能性(这是个原则的否定,这不是由于我们无知而做不到,却是由于生产的本质,它的概念,不允许这样做)。马克思还指出……简单过程远非是原始过程……,而只不过是复杂过程的产物。……简单过程只存在于复杂的结构之中;简单范畴的普遍存在……仅作为一个历史长过程的结尾出现。”^③

让我们不要受这段话很大影响。阿尔都塞所讲的不过是关于必定发生的“漫长的历史过程”。然而,应该解释的事实是,例如生产(或者,还有更重要的劳动)这样一类“简单的范畴”是如何在一个社会整体中达到如此广泛意义的。至于对这个整体本身,我们不期望能提出关于它的发生的种种问题。相反,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在“探究过去的知识”^④范围内,我们而对着“总是前定的东西”。因此,历史(尽管有许多相反的论断),对所有实践目标来说,是不被考虑的。取代辩证的总体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页。

②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95页。

③ 同上书,第195—196页。

④ 同上书,第199页。

的，是同无内容的总体主义一样僵化的总体主义^①。鉴于这样的前提，阿尔都塞如何构想历史的发展，连续性和爆发性过渡，仍然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在他的《社会形态的斯宾诺莎主义》中，时间似乎丧失了“对前后、对直接性的一切联系”^②。

阿尔都塞一而再、再而三提及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即作为“最简单的经济范畴”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③。但在同时，他忽略考察下列一点：在这里马克思并未提出一种超时性的方法论准则，而是在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论及到对象的“叙述”（它是典型的，并摆脱了直接的经验材料），而且非常透彻了解关于历史的“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④并未解决。相反，它需要更仔细地讨论。马克思（这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核心）专门解释说，问题在于应该将“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⑤（他追随黑格尔，称之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⑥）与作为现实的具体现象的世界本身区别开来，但不可以忘却这个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⑦。阿尔都塞承认这种区别，正确地看到理论家们总是依然联系到以概念为媒介的现代（作为已呈现出来的整体），并不可能任意地走出

① 这一点在阿尔都塞论述矛盾学说时变得尤其明显。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他最重要的权威人士是毛泽东，他似乎共有毛泽东的更加拘泥形式的和在本体论上朴素的辩证法规。

② 雷蒙·阿隆：《马克思主义的神圣家族》，汉堡，1979年，第209页。也可参见第208页。在那里，阿隆（他从一种对立的立场出发达到重要见识，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历史方面，尤其是如此）把阿尔都塞的“无时间的历史知识的尝试”同列维-斯特劳斯的“未开化的思维”对立起来。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页。

④ 同上书，第23页。

⑤ 同上书，第39页。

⑥ 同上书，第38页。

⑦ 同上。

它自己的结构。但他堕入了思辨唯心主义（他如此大叫大嚷地抨击的正是同样的内容），倘若他要从此引出这样一个思想，即从一个以逻辑定义的整体永恒存在出发，是科学的，因为，将一个构成的客体同现实的（即历史的）客体区别开来，只有在现存的思想内方能表达清楚，因此仅是一种虚幻的区别。

马克思处理这个问题则更恰当一些。他知道阿尔都塞所牢牢坚持的东西：即所谓“简单的”范畴的特殊作用仅是在充满前提的总体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然而，他提出了“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①的问题，换言之，它们是否也是总体的组成要素，因为它们反过来把自己的特征归之于总体性。到这程度就是这种情况，当

“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②

在雇佣劳动、资本和银行存在之前，商品生产和货币在历史上存在是可能的，因此，“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需要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结构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在某种特定的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9页。

② 同上书，第39—40页。

③ 同上书，第40页。

上说，“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①。马克思所研究的生产关系的范畴表述，不是在中介的意义上，就是在直接的意义上，或者两者都有之，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历史上的。思想过程对于它的内容是自律的、而不是顺从地摹写它达致的程度，也就是思想过程导致理论建构的程度。而且，对于历史材料来说，这个过程依然是客观的（以及经常把自身处于它的控制之中，以不致于僵化为一个空洞的“体系”）的程度，也就是它接近批判的历史编纂学水平的程度。思想过程对历史基础相对的独立性与依赖性这两个方面一并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有时出现的它们彼此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这一事实，是归之于“叙述方法”同“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

“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②

谁认清了《资本论》中历史与“体系”之间的客观矛盾关系，谁就不会混合，同一或者分离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反而将按照认识过程在那时所达到的水平，寻求确定这些要素的分量和位置。这肯定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它是一个结构主义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0页。也可参照第41页。关于历史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的统一特定形式，还可参阅奈特·科尔迈的论文《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过程》，载《政治经济学问题》，柏林，1959年，第81—85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第23—24页。

思学的学者们几乎不能提出的，更谈不上解决的一个任务。阿尔都塞的解释，粗暴地把马克思的作品分为二个异质部分，不只是牺牲唯物主义历史以适应理论上所建构的历史。从技术上考虑，那是正确的，在特定的范围内，也是必然的。然而，它意味着一种本体论的退步，因为它放弃掉对自然存在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历史性的基本见解。

葛兰西的真正的历史人道主义

当阿尔都塞及其学生轻视地谈论“历史主义”时，他们会想到诸如卢卡奇、萨特与列斐伏尔这样一些作者。他们视为意识形态的面加以拒斥的马克思解释的倾向，在葛兰西那里早已以最适当的形式存在了，而阿尔都塞曾经（在“左派观点”的标题下以独特方式）更周密地论及葛兰西^①。作为一个既尖锐又机敏的布哈林“机械论”的批评家，葛兰西是受到他那个时期的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的^②。而且，他以类似于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表述方式，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征为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真正的历史人道主义”，也表述为“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思辨知识（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论述费尔巴哈的部分中所解释的）分解成现实的历史和历史编纂学两个方面^③。

① 参见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读〈资本论〉》，纽约，1970年，第119页。

② 首先是克罗齐和金蒂雷，不过，葛兰西也批评他们的思想局限于思辨神学领域。

③ 参见雅克·泰克西埃的《葛兰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巴黎，1966年，尤其是第13—20页。阿多诺的马克思解释也包含这种历史因素。有关论述葛兰西整个思想的，可参见克里斯蒂安·里希尔森的有见识的和批判的研究：《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美国河畔，1970年。

这适应于他的“内在的”和极端“主观主义的”现实概念（在许多方面人们可联想起波格丹诺夫），他把它还原为“纯粹历史或历史性以及纯粹人道主义”^①。对葛兰西来说，定义结构概念特别重要。有关它的内容，就是说以彻底的历史方式，资产阶级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家往往已够充分地规定结构概念“为现实的个人行动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规定为能够和应该用语言学方法而不是用思辨方法对之研究的客观条件的总和”^②。

唯物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规律

按照葛兰西的意见，只有当作为“实践哲学”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历史方法论”^③时，它才公正论述它的革命任务。然而，由于历史过程的丰富多采拒斥覆盖在现象上的一切贫乏的分类图式，由于普遍的“趋势规律”只有在下列范围内能被得知，也就是在“以唯一的和不可重复的个别性存在的各个事实能被确定和详细说明”^④的范围内，这样一种方法论要求一种锐利的语言——批判的工具。相反，——这使问题复杂化——在从早先研究与批判的认识中所衍生的社会总体运动的规律同基于当下的经验材料和经验方法的规律之间不存在连续性。从历史观点看，存在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由于我们正在论及极少可和谐共存的现象。唯物主义经济学的范畴和法则（尽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7年，第253页。也可参见第197页。

② 同上书，第253页。

③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纽约，1971年，第428页。

④ 同上。

管它们主张客观性)并未能直接地或者说广泛地表达出19世纪的各种生产关系。那将会是不可能的,相反,它们通过一部分一部分抽象,以一种间接方式,即作为一种增强的总体,都做到了。马克思本人强调说,当这些关系在科学上确定下来,它们的定义就变得更加贫乏,失去了它们的历史多样性,因此也就失去了外在的“偶然的”和“非本质的”各种要素,而它们在实践中是重要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写道:“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①各种指向特殊的和个别的事物的分析,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0页。在同上书另一处,马克思写道:他从未描述过“现实的竞争运动”,而“可以说,仅仅以它的理想的平均数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组织”。与此类似,列宁批判司徒卢威,是因为他把“抽象的实现论……即某个国家某个时期资本主义产品实现的具体历史条件”混为一谈。(《再论实现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59页)同马克思一样,列宁强调:“资本主义的规律……也表明资本主义的理想,而决不是表明资本主义的现实”(同上书,第70页)。规律“只能通过不起作用而起作用”(同上书,第61页)。所有这些,当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以为马克思·韦伯的所有过于唯名主义的解释是正确的。按韦伯所说,“所有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发展结构……具有理想型式的特征”。韦伯强调“这些理想型式的突出的、确实独一无二、原发性意义,要是人们利用它们来评价现实”。同时,他又提醒“它们的有害性,只要人们以为它们是经验上验证的或者现实的(即,真正形而上学的)‘有效的力量’、‘趋势’等等”。(马克思·韦伯,《社会学方法论》,纽约,1946年,第103页,着重号是原有的)无疑,在这段文字中,韦伯正确地指出了把历史知识“反过来变成理论的解释,即力图使理论家把这种关系,或者看作为正常的关系,或者,最糟的,看作为理论与历史混合的关系,并且它们彼此混合在一起的关系”(同上,着重号是原有的),是多么不严肃。显然,类似之处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并不罕见。然而,承认这点并未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主张,凭借它的结构状客观对现实情况。同韦伯的理想型式相比,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范畴是连词形式,基础在内在的常识。韦伯所强调的阶级—政治的概念(他是在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提倡的“唯物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标题中表达它的)存在于它的主观主义中,这种主观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仅仅作为启发式的结构,借助于虚构,不合理的现实(由众多单个事实组成)将得到调整。

结果并未成为多余的。恰恰相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家对他们自身的专业领域情况总是非常熟悉的。然而，应该记住：在经验上或在历史上所获得的发现，至少就直接意义上说，是不能够动摇或证实有关社会总体性的论断的。教条地设定一种完全不受根据新出现的事实作修正的影响的总体知识，同样是无法接受的。黑格尔说：“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平静的反映现象的平静的内容(在其中表现出来)……它不过是在不停的变动中并作为对它物的反映而呈现自身的同样内容。”^①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这意味着(类似于有的逻辑中的量的范畴)，即在一定的变化范围内，本质(规律)对于它的现象的具体历史模式而言仍然是毫无区别的。它的概念反映着在客观实在进程中相对地经常的、大量的，自我重复的因素^②。如果本质必定表现出来，它们内容由现象的概念化的内容组成。因此，这些现象的变化扩展到本质自身。构成当前讨论背景的一个问题是，自马克思和列宁以来，资本主义是在本质上还是仅仅在非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如今它是否还在根本不同于马克思曾揭示其本质的经济现象中显示出来。西方

^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503—504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黑格尔的规律是现象的平静的反映的理论给列宁深刻印象，他在《逻辑学》一书摘要作评注说：“这是极其唯物主义的、极其确切的(从‘平静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平静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有限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哲学笔记》，第159页)现象比规律更丰富的思想(同上书，第160页)来自黑格尔本人，但这个思想在黑格尔理论中仍保持着原有面貌，而辩证唯物主义却把它向前发展了。由于各阶段的历史的和过渡的性质，因此一切阶段的人类知识仅有一种近似的意义，尽管黑格尔作为“抽象的”预防而拒斥这种普通的论题，并要求将不断更新地“使用概念”，但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在这个方面更有力地指向科学研究的实际过程)在建构它的各种概念时从一开始就得到前述的论题的指导。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威廉·赖蒙德·拜尔的(以列宁的黑格尔解释为线索的)论文：《黑格尔的‘规律’》，载《哲学和单门科学中的规律概念》，柏林，1968年，第47页。拜尔强调唯物主义地所构想的规律概念的“可校正性”、“可完满性”和“可检查性”。

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的范畴证实着一些与这个问题相联系的困难。

葛兰西的历史编纂学概念

让我们回到葛兰西的问题。他想到的不是《资本论》构成的历史概念，而是历史编纂学。后者没有蜕化为毫无精神的编年史，而同历史的结果相一致，因此不会为抽象的社会学规律牺牲掉个人和个别事件的特殊性与不可重复性。即使有人暂时忽视这个假定，即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事实是绝对唯一的，或者理论是自由的，并只有通过直觉（一种典型的人文科学偏见）才可被接受，不过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不管历史是由政治经济学建构的还是由它描述的，历史对政治经济学具有的意义不同于政治经济学对历史科学具有的意义。关于普遍而又超越的结构对特殊和个别事实的关系问题，在这两种情况中有所不同。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研究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并在“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和大工业”的标题下，追溯了自中世纪后期以来的近代工业史。这样，从一开始他清楚地知道，他在处理极其概括的材料，他把这些材料从属于所选择的过程。在他的“历史的概述”^①中，他叙述的只是“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②。换言之，在《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30页。

^② 同上书，第408页。在评论《资本论》时，恩格斯正确地谈到马克思提出的“近代工业史的分析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34页。

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建构了他描述(资本主义)的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且也建构了彼此相关的各种历史发展形态。

比较起来，历史编纂学是在不太高的抽象水平上发挥作用的。正如葛兰西所指出的，它要求一种考虑各个个别事实具体内容的语言学方法。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抽象社会学”，——葛兰西恰恰据此批评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给予对整个历史了如指掌印象的一个机械的公式^①就会出现。实际上，布哈林的确把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表征为社会学，并把社会学表征为“在各门社会科学中最为普遍(抽象的)”^②。它从历史中采集它的材料，并为历史提供一种方法。另一方面，布哈林将以这种意义所理解的社会学同历史与经济学内容割裂开来。他将它定义为“普遍的社会理论和社会演变规律”^③。毫无疑问，唯物主义的历史因此被贬值了，因为历史所面对的是一种仅将各种历史事实放入已是现成的坐标体系之中的理论。布哈林并未讨论这个相反的重要思想：即历史过程构成理论过程，并改变它的范畴^④。正当它到达辩证法时，他完全丧失辩

①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27—428页，关于整个问题可参见葛兰西对布哈林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对尝试通俗社会学的批评札记》，同上书，第419—472页。

② 尼古拉·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安阿博尔，1960年，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这里有必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解释理论与唯物主义历史著作的理论实践之间关系有所不同，两人各自彼此相互校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1页中，他们写道：“对现实的描绘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重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

证法(他追随波格丹诺夫,用一种均衡论取代了辩证法)。

毫不奇怪,布哈林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结构要素的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一个同这些要素的历史源泉的论点不相一致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有关它们的理论具有新质的内容问题。布哈林恰恰未曾把握这一点。葛兰西正确地指责布哈林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一种作为社会学出现的发展理论,它按照自然科学标准行事,并(同某些当代著作家一样)导致一种空洞的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另一种是狭义的哲学,它相当于一种粗鄙的唯物主义(荒谬地自命为是“辩证的”)^①。关于这种割裂,葛兰西写道:“割裂了历史理论与政治理论,哲学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然而以实践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史上的伟大成就,恰恰是哲学的具体历史化和哲学与历史的同一化。”^②

作为一个克罗齐的批评者的葛兰西

以上提供了葛兰西观点的概要,而且仅仅是提纲挈领。他要求一种“辩证的科学或知识理论,在其中,历史、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普遍概念相互紧密结合于有机的统一体中”^③。在其它地方,葛兰西更确切地阐述这个思想。他批判克罗齐的思想,是因为它要求“历史与哲学的同一”,而仅仅为了把历史变为

^①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34页。在苏联的教科书中,这种事实上和文字上互不关联的分割倾向一直持续到现在。当然如今在阐述它时力求较少简单粗暴。

^② 同上书,第436页。也可参见葛兰西的《历史与哲学的同一》,《实践哲学》,第268页。

^③ 同上书,第431页。

“伦理政治史”，就是说，变为上层建筑现象^①。只有当同一也导致历史与政治的同一（人们必须用“政治”来理解自我实现的政治，而不是理解这些反复实现的企图，因其中某些企图将失败），并终于导致政治与哲学的同一，这样一种同一才达到完整意义的同一。如果政治家是一位历史学家（不仅在他创造历史的意义上，而且还在他边在当今舞台上活动边解释过去的意义上），那么历史学家也是一位政治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总是当代史，即政治^②。这是一个克罗齐的激进的历史主义无可非难的严肃结论。确实，他主张从他的思想中铲除掉一切超验的、神学的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残存成分。但是葛兰西令人信服地指出，克罗齐并未兑现他的主张，他的哲学依然沉溺于思辨之中：“在他的哲学中保有全部超验性和神学，几乎没有摆脱最粗陋的神秘外衣。”^③

葛兰西讨论了在克罗齐历史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的政治立场，推测这可用民族特殊性，尤其是用“在意大利历史中缺乏统一民族的首创精神的历史事实”^④来解释。正如葛兰西所指

① 关于克罗齐批判历史编纂学的努力，参见《意大利史的笔记》，第118页。

② 葛兰西：《实践哲学》，第268—269页。可惜，我们必须放弃更进一步考察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近于贬意的可追溯到马克思身上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作为被动的“反映”，物质存在的“必然现象”，参见同上书，第271页），葛兰西理解为“积极的”概念，按他所说，这个概念是“哲学与政治同一”的产物，它不允许将意识形态——葛兰西（同克罗齐一起）把各种意识形态表征为“政治行为的工具”——同哲学割裂开来。归根到底，它们是同一的。葛兰西写道：“意识形态将是‘真正的’哲学，因为意识形态显示了哲学的“普及化”，把群众引向改造现实的具体行动。由此，它们使每一个哲学概念具有大众化的外貌，而在哲学家中，哲学概念具有超时空的抽象的普遍性的特征，具有有书本渊源而无历史渊源的专门特征（同上书，第268页）。尽管如此，葛兰西察觉到哲学与意识形态同一化所固有的危险。（参见同上书，第269页）。

③ 同上书，第253页。

④ 同上书，第270页。

出的，此过程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创造出一种令人瞩目的在革命与复辟之间来回变换的意识形态。在意大利，这种发展过程的出现，主要是作为统治阶级对人民大众自发的、无组织的起义的一种反动。接着而来的“复辟”实现了无产阶级的某些要求，按他所说，是“进步的复辟”或“被动的革命”^①。这样，克罗齐的历史主义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即只允许政治活动通过“保留与革新的辩证法”推动进步，就将自由因素与保守因素混合一起^②。作为一个黑格尔派的葛兰西，赞同主张的事物在历史上新事物中既受拒斥又被包含的观点。然而，在克罗齐看来，这个原理变为意识形态的，“只是一种实践政治趋势的反映”^③，他相当任意和先验地相信，在他能规定必须保留什么、排除什么的范围内，确是这样。像其他自由改革派一样，克罗齐鼓吹在由历史所强化的意识假像下的“一种前定历史的巧妙伪装形式”^④。呈现为赫拉克利特之河的纯粹冥思的，实际上是与利益相关的阶级立场，这种立场不是显现在直接的反动内容上，而是显现在它出现的形式和方法上。在克罗齐的意识形态中，黑格尔的“否定性”失去了它的风味，照葛兰西的解释因为克罗齐的意识形态趋于“使反题失去活力，把它们分割成一长串孤立的环节…并把辩证法变成一种改良主义的进化过程，一种‘革命—复辟’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只有后一个时期才确凿有效”^⑤。相反，葛兰西的科学的历史主义显示出，它依然向这个过程的客观性开放。不能预断在往昔巨大的复合体中哪一些要素常将保留在未来的状态之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第270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271页。

④ 同上书，第272页；也可参见第271页。

⑤ 同上书，第273页。

中（虽然人类的意识必定适用于人类历史所达到的水平，并具有掌握其本身内在于历史的期望价值的办法）。葛兰西认为，不管过去如何走向未来，“总将具有历史必然性的特征，而不是所谓的学者和哲学家们声称的偶然选择的特征”^①

葛兰西通过把现实概念回复到“纯粹的历史或历史性以及纯粹的人道主义”^②，主张实现一种严格的“内在论的现实概念”的新黑格尔主义方案。然而，这种设计不承认一种静态的人类学。无论何处，葛兰西都不会忽视“历史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内在性”^③。作为历史矛盾最完全表达的“实践哲学”，拒斥不变结构的假设：“‘一般的人’，不管他以什么形式呈现出来，均要被否认，并且，一切学理上的‘一之的’概念，作为‘一般的人’的概念或内在于每一个人之中‘人性’概念的表述，会被摒除和毁弃掉。”^④在葛兰西思想的基本方面，他看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遗产（当然，以近代史为中介）保存在马克思的思想中。

我曾讨论过葛兰西对布哈林的素朴的本体论（它解释葛兰西的认识论思考的极其夸大其词的“主观主义的”特征）和对意大利的新黑格尔主义（以及它对马克思的接受）的批判，首先是因为阿尔都塞学派代表人物想到葛兰西，然而他们所论及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错误解释。显然，葛兰西在战后的西德是极不知名的，可是他自大战结束以后对法国的知识分子却一直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巴黎人特别批评葛兰西偶而谈到的马克思同古典经济学关系的论述，实际上，葛兰西科学—理论的设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第271页。

② 同上书，第239页。

③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399页。

④ 同上书，第45页。人的本质“不统一”的思想将葛兰西同肇始期的批判的理性联系起来。对此参见马里斯·福克海默《评哲学人类学》，载《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1935年，第1期，第1—25页。

计的局限性在这些评论中变得清晰可见。葛兰西从克罗齐那里^①接受知识论与历史主义的同一、哲学同历史著作的同一，可能部分地证实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及在狭隘的字义上证实他的历史著作）。但是，尤其从国内经济学看，它对如今有争议的《资本论》中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几乎没有作什么贡献。

鉴于它涉及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因此稍花些时间研究一下这个问题还是值得的。虽然葛兰西的概念可能依然保持“实验的”和“有美感的”^②特征，他同卢卡奇和柯尔施一起，可侧身于20世纪20年代初有意返回到黑格尔辩证法的最有功绩的著作家行列之中，这样，葛兰西将新的生命注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哲学的内驱力中，而后者正经受粗陋自然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正统论和苏维埃俄国的正统论的损害（然而，这是以或多或少严重的唯心主义的旧病复发作代价相伴随的）。有时曾被解释为葛兰西思想上不连贯的（他的范畴的“流变性”）实际上归因于他求教于黑格尔这一事实，因此他谨防同历史相反的各种假定，并牢记真理是一个过程的特性。

葛兰西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科学—理论地位

在再次讨论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时，让我们转向葛兰西思

① 对此参见《克罗齐论文选》，巴里，1897年，第一页。

② 大多数葛兰西著作是在狱中健康不佳又无学习资料的情况下写成的，这些著作产生许多矛盾。实际上（正如里欧尔的适度虚构而受损害的书，尤其是第10—36页表明的）这些缺点可追溯到这一事实，即在葛兰西思想形成时期，他不仅受到克罗齐黑格尔主义的影响，而且在诸如金蒂希和索多尔用主观唯心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受到很用“出自埃布里奥拉的哲学经历的一元意识的概念”的同样影响（参见同上书，卷六，18页）。实践哲学的来源出自本什利夫斯基的《历史学的序言》（柏林，1838年），并由拉布奥奥位约在本世纪交替之际引入意大利的讨论中。

考的政治经济学方面。虽然在一些个别地方存有问题，它们也包含着对马克思作批判的解释一些重要因素，超越着仅仅作为一种公开声明的世界观的解释。

葛兰西批判“机械的唯物主义，而它起初不是在布哈林的作品中而是在战前时期的“修正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作品中被他察觉到的。伯恩斯坦的著名公式——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标是微不足道的——就是用机械论替代了历史辩证法。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中，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的评论被忘却了：“人的力量被视为被动的与无意识的，被视为同物质的东西无所区别的的元素，并用庸俗的、以自然主义作解释的进化概念置换发展概念。”^①在修正主义者理论上允许人干预事件的铁一般的发展过程的范围内，它是作为“阻抗与保守的正题或环节(而不是作为)反题或……首创精神出现的。为了强化它的超越运动，反题或首创精神是以唤醒潜在的、敢于促进的力量为前提的、并需要提出直接的和居间的目标”^②。

这是一个完全恰当的批判，也是一个使葛兰西陷入困难的和经常提出的问题的批判，即该如何评价马克思作品的科学一理论地位。为解答它，葛兰西追忆列宁在1913年所写的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在论及马克思时写道：“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③但是这尚不能解释，正如葛

① 葛兰西：《实践哲学》，第192页。

② 同上书，第192—193页。

③ 《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2页。

兰西表述的，“这三个文化运动”^①以什么方式渗进马克思的学说结构之中。假如这个结构“综合了……这个时代的整个文化”^②，所有三个源泉作为先进的要素必定在结构中再现。指导葛兰西的正是这些先行要素的再现。他进一步推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的综合要素该同一于固有性的新概念中，这种新概念已从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思辨形式借助于法国政治学和英国古典经济学转换成一种历史形式^③。

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同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的解释

葛兰西建议综合考察马克思理论中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他写道：“在一定意义上说，……实践哲学等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④应该把这个论题理解为真实的论题，而不是一个外界创生的论题。它提出这个问题：即关于李嘉图引进经济学的一些原理是否仅止于探究它们的工具功能，或者说它们(虽然首先按照形式逻辑来构想的)是否意味着是一个真实的哲学上的创新。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就是肯定地回答它。但这并不是说，葛兰西的粗略的笔记解决了从李嘉图过渡到马克思的问题。但有别于结构主义的解释，它以更适当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葛兰西认识到，李嘉图首次发现“演变趋势的规律”的客观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包括了固有性、

①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399页。

② 同上书，第400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必然性和自由等一类新质概念。正如葛兰西所写的，由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这个概念“使李嘉图的一些发现普遍化，用一种适当形式将它们扩展到整个历史”^①。

葛兰西特别热衷于辩证地重新确定由李嘉图经济学开创的规律概念，他再次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提到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源泉问题。他以为，资产阶级达到无所不及的水平，并且一个“世界市场”发展为“人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形式”^②，这作为异己的力量反对他们的程度，也就是在同等程度上它“可能孤立研究有序的必然规律”^③。葛兰西立即补充说：“这些是演变趋势的规律，它们并不是在自然形式的和思辨决定论的意义上的规律，而(是)在‘历史主义的’意义上的规律，就是说，在这个范围内，存在着‘确定的市场’，或者换言之，存在着生机勃勃的外部环境。”这个观点对李嘉图来说，依然是难以接受的。他的方法认为这些规律仅作为“现象的数量表现”。换句话说，它依然是在资产阶级思想的视界之内。这个视界已被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到普遍历史的过渡”所超越，在这个过渡中为了充实规律概念，“数量概念同质量概念结合了”^④。

对葛兰西来说，一个自由与必然之间关系的理论的和实际

①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32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③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01页。

④ 葛兰西(当然以探索性的和概要的方式)预见现代研究的成果。参见捷克哲学家金德里奇·策勒尼的主要著作：《马克思的科学逻辑和〈资本论〉》，柏林，1968年，尤其是第1—2章。在那里，策勒尼根据对片面的定量论的批判来阐释马克思—李嘉图的联系。

的变化，伴随着各种质量要素的整合（这种整合标志着与古典经济学相决裂。突出数量同必然性相适应，突出质量与自由相适应。前者表征历史过程的迄今现存的类似自然的性质，后者表征人类学习控制统治自然的社会形式的任务。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的著名论点：“历史发展在某个时刻将用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来表征。”^①如果认真思考一下，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决不主张永恒的有效性，而是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对条件的概念的和自觉的表述，至少在原则上，它已发觉了条件的暂时性。无可辩驳的预测不可能从此产生。不过，只要这些条件（它们不可能受产生它们的个人所控制）继续存在，唯物主义理论与其说同至今并不存在的自由相联系，还不如说与必然性相联系。

葛兰西写道：“现在，哲学家—实践哲学家——……不能逃避现存的矛盾领域；他不能证实不同寻常的没有矛盾的世界，他也不需要立即设计一个乌托邦。”^②由于乌托邦的抽象性，这种乌托邦可能具有极小的哲学价值或者甚至极少的政治价值。不过，它无论如何更愿接受不仅受资产阶级思想而且受庸俗马克思主义思想所广为传布的对毫不粉饰的事实的盲目崇拜。这里，葛兰西想起诸如考茨基和布哈林这样的直接表现客观主义的代表人物，处于敌对阵营的这些人有助于传布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解释。他对历史发展的类似自然的规律性的思考，是非常明显地值得进一步阐述的。

葛兰西认为马克思直接从自然科学借用“规律性”和“必然

①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04页。

② 同上书，第406页。

性”的历史理论范畴，是不大确实的^①。确切地说，在这方面它们更多出自（这里葛兰西尤其采用晚年恩格斯的重要论题）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尤其在形式和方法论方面，是大卫·李嘉图将它们提供给经济科学的”^②。葛兰西继续写道，古典经济学达到了这个见解：

“即决定性的长期起作用的力量，以一定程度的‘自动作用’表现自身，这种自动作用允许承认这些力量的个人首创精神对未来有一定程度的“可预见性”和‘肯定性’。……一旦确认了这些力量的自发的自动作用（即它们对个人选择和任意的政府干涉的相对独立性）之后，经济学家借助于假设使自动作用变为绝对的；他将一些纯粹的经济事实与不同程度重要性的结合割裂了……这样他描绘了一幅一定的经济社会的抽象图式。（这种现实主义的建构后来就此被强加于……‘人’的本身抽象上，已被看作为‘真正的’经济科学的非历史的抽象上。）”^③

这就是葛兰西相当概略但又从主要方面校正着经常在教科书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想的政治经济学前提的叙述。葛兰西察觉到，市场机制以及通常“呈现为可同自然现象的自

① 同时，如果不汲取自伽利略和牛顿以来的规律概念，那么圣西门的“社会物理学”以及马克思论及的社会“运动规律”，全都不会构想出来。关于这个困难问题，可见我的著作：《当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②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10页。对于葛兰西评价李嘉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中的作用，参见同上书，第412页。

③ 同上书，第410—411页。

动作用相比拟的某种‘客观的’事物的社会现象形式”^①，是通过个人的自觉行动被传递到主观方面的，而这些行动相对于它们起一份作用的社会总结而言是无意识的。葛兰西强调，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永恒的和自然的东西，一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就反过来成为暂时的和人为的东西。在他看来，如果在探究社会结构时，这种批判决不会忘记把握创造这些结构的各个个人的活动。

接着，我将对当今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概念至关重要的葛兰西的“真正的历史主义”的那些方面，简要地总结一下。虽然在我的论述中至今还几乎未曾注意这个事实：这些方面实际上是属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在30年代所构想的批判的批判的范围之内。

1. 哲学、政治学 and 经济学是马克思作品的“来源和组成部分”(列宁)，它们构成马克思作品的内在统一，因此彼此间是可相互传递和解释的。哲学的论述常常同时又是政治学的和经济学的论述，反过来也是这样(并没有因此使意义层次变得任意受混淆)。它们连同一起形成一种“同质循环”^②。从一种解释的观点看，葛兰西主义的这个见解是重要的，因为其中它提醒不要仅在马克思使用惯常的哲学语言的地方去寻求马克思的哲学元素。往往(这也适用于列宁或毛泽东，只是有稍许不同)马克思的历史—政治著作比起那些专门论及哲学题目的作品来，包含着更加激发人们兴趣的哲学方面^③。

① 葛兰西：《狱中笔记选》，第411页。

② 同上书，第403页，也可参见第395页。

③ 参见马克思的这样一部政治著作：《哥达纲领批判》。它写于1875年，就在那时马克思长期来把专门的哲学论争搁在一边。但是，它同时包含着对唯物主义认识论而言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思想：即人类劳动(理解为“构成的”、感性的具体的

2. 葛兰西遵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拒绝将唯物史观的认识论问题同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割裂开来。因此, 在他的阐释中, 关于不同的意识形式对于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制约性)的论述, 丧失了众多的执政党的解释所坚持认为的这种特征, 即未经证实的本体论论题的特征。这样一些叙述往往给人这种印象: 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等于是将一个完全封闭的哲学简单地运用于一个同样完全封闭的并且是前定的专门领域。这样一种观点压制了两点: 首先, 最重要的是在关于经济学内容方面, 马克思能在哲学上(尤其在认识论上)发展一些极为重要的范畴, 他已洞察了它们的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其次, 他批判地吸取一些黑格尔主义的主题, 决不局限于他的早期著作, 反而恰恰在1850年之后以更为明显的概念级上重新再现^①。

3. 葛兰西的笔记描述了在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学批判之间经常受忽视的内在联系, 但并未详细地研究这种联系。然而, 当葛兰西试图将客观力量对人们的支配, 即存在对意识的支配

活动总是涉及到一种已经“构成了的”而不依赖人类劳动的现存的自然基础。参见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第20页。我以这个思想为出发点: 人们不要假定只有当马克思运用学院哲学语言之时, 才最富有哲学思想。我在我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一书中, 曾试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提取哲学上的重要内容。在《读〈资本论〉》一书中, 阿尔都塞正确地强调了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基础上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性。不过, 这不意味着人们可以忽视马克思的成熟时期著作同他早期著作之间发生的(并也是文本上的)联系, 或者可以像阿尔都塞在他的解释中所作的那样, 抽象否认黑格尔对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影响。

① 显然, 这一切并非仅仅是一些字面问题或说教的问题。列宁致力于稍许关心马克思的哲学对政治经济学的密切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 参见他的论文《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 第20卷, 人民出版社, 1958年, 第185--186页, 在此文中, 他(在批驳斯特罗夫时)指出,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统一”是建立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的基础上的。

追溯到史前时期的无法控制的价值规律的统治，如他所着重指出的，社会主义理论就旨在统治的终结，说明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枢。因此，他的否定的解释颇受注意，因为削弱了这个仍然流行的观点，“说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有人也许会说法则学的规律概念’缺乏思考”^①，而这是以半宗教的拯救保佑样子出现的。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世界所批判的——在此社会造物被崇拜为自律的自在物自体，个人屈从于它的严格的客观性——被这个观点（它在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者中广泛传布）提高到一种科学的规范。相反，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明确强调，像在所有辩证的事物中一样，在这里中介也贯穿于极端。作为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的自然规律”的产物的存在和自在物自体是作为抽象分割的要素而补充的。如阿多诺所说：“社会服从自然规律的论题是意识形态，如果规律被假设为由自然赋予的不可改变的既定物。但作为无意识社会的运动规律，这种自然规律性是实在的。”^②对阿多诺来说，马克思为了在未来废除规律而阐明规律，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最强有力的动机”^③。

葛兰西的历史与理论的牢不可破的同一，他的“纯粹的”过程和（意指未来是绝对受人的影响支配的）实践的思想，以及有关在费希特意义上^④的主体优先性的确认，所有这些使他不得

① 于尔根·康拉德、埃贡·贝克：《社会科学统计学论证的基本特征》，奥普拉特，1971年，第30页。也可参见这部重要作品的第12、31页。

②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纽约，1973年，第355—356页。

③ 同上书，第355页。

④ 在许多地方，纯粹历史性的思想将葛兰西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和时间》，同马库塞的本体论的开端，尤其是同卢卡奇的早期论文联系起来。对此，可见我同弗雷德·塞吕蒂、德特雷符·瓦劳尔、汉斯-于尔根·拉特和奥斯卡·内格特讨论的作品，载《当今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法兰克福，美国沙群，1971年，第8—16页。

不招致被结构主义指责为素朴的历史主义。在下一部分我将再次解释，在这种批判中的重要之点，忽视葛兰西的冲动(尽管有缺陷)是一种伟大的冲动。在原则上，这种批判不会使马克思作品本身免遭类似的批判。现今已达到的讨论水平允许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一些新的方面。

对马克思解释的一些困难

除了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普兰查斯的一些作品外，《读〈资本论〉》一直是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解释的最可靠的来源。在1968年，阿尔都塞和巴利巴尔出版了更为紧凑简炼的新版二卷本^①。在那一版的前言中，阿尔都塞反对几乎毫无例外地一直把他学派的一些概念判断为结构主义的一个变种。尽管尤其具有术语的类似性和某些解释的多义性，阿尔都塞声称他自己理论努力的“意义深刻的意向”，应该是明显区别于每一种“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②。他坚持认为，在他的作品中出现的“组合”概念同惯用的结构主义的“组合”概念毫无共同之处，更不用说他的诸如经济的优先性、支配、多元决定或生产过程等其它范畴了。这种申明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在学理上以只有阿尔都塞主义提出了一种合适的马克思的评注为前事的。这种评注对自身要求的——它的真实意向将不会受到表述它的术语的损害——被假定为比马克思本人还更为真实。当然，

^① 原版(巴黎, 1965年)也包含了罗歇·埃斯塔布莱、雅克·郎西埃和皮埃尔·马谢利的作品。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总览, 就必须涉及到它们。再有, 莫里斯·戈德利尔的《经济学中的理比与非理性》(伦敦, 1972年)也是重要的。

^② 阿尔都塞、巴利巴尔, 《读〈资本论〉》, 第7页。

一个仔细的解释者将会提防幼稚地阅读本文。如同他一类的其他作者一样，马克思作品的唯物主义成果，并未（或仅仅是部分地）同在他的政治上有重要结果的并经常行证的序言和跋中他作为固定的自我理解偶而描述的内容相一致。而且，像马克思著作这样有综合性内容的著作，只能渐渐地给以阐明。以前一直被忽视掉的其著作的一些新的方面，只有理论的（和实践的）需要到了出现揭示它们的程度时，方可显露出来。例如，以康德主义的、黑格尔主义的以及甚至是存在主义的解释（尽管在这些分析中存在夸大其词）为中介，这样一些以前不为人知晓的马克思著作的特征，已经变得清清楚楚了。当然，类似作用也转移到最新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解释方面。然而，这种解释的倡导者并不满足上述的作用，而代之以希望提出一个“完全新的”马克思的这个事实，表明他们在寻求达到以往努力的光辉顶点。

无疑，面对结构主义的解释——尽管我们有一些相反的主张——需要特别小心。马克思解释的不断变化史得出这个结论：无论何时为了精神实质牺牲所谓的字母，受损害的正是字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坏的斯大林主义歪曲，是在批判犹太法典解释者和书呆子的名义之下进行的，阿尔都塞的方法并未脱离这种有害而又不幸的传统的轨迹。他并未用结构主义语言解释（或者只不过很少这样解释）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样一种解释肯定会用来阐明它的）。毋宁说，他直截了当地将各种结构主义的观点表述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点尤其适用于像历史概念一样的《资本论》的基本概念。

在老社会民主党眼光中的《资本论》

我们在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一下在19世纪中马克思的主要作品的接受史，是有益的^①。只有这样，人们方能公开评判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的再解释。

除了诸如兰普雷希特 (Lamprecht)、施莫勒 (Schmoller)、马克思·韦伯和佐姆巴特等资产阶级学者，他们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一些个别要素运用于他们的经济学和社会历史的研究之中。第二国际的一些重要理论家也维护这个论题：马克思的功绩首先具有历史编纂学性质。例如，考茨基把《资本论》看成为一部“实质上的历史著作……(一个)新的历史的和经济学的体系”^②。紧随考茨基之后，梅林断言，“关于历史的”《资本论》类似于“其宝藏大部分未曾发掘的矿山”^③。1893年，梅林就写下了这几行字，整个马克思的毕生著作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恩格斯的一些著名的信函也显示出类似的强调)。在正式的学术界中，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历史编纂学的重要意义，几乎未被承认，更不用说被理解和认识了(无疑，甚至在今日，这样的知识依然是罕见的)。在老的社会民主党中，双重任务落到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文献研究家梅林(连

^① 见罗尔夫·德鲁贝格和汉内斯·施坎勃拉克，《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67—1878年的德国工人运动》，柏林，1967年。它论及《资本论》的政治上和文献上的影响史，包含着一个由文件的集成而增益的历史纲要。

^② 卡尔·考茨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学说》，斯图加特，1877年，第75页。

^③ 弗兰茨·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柏林，1952年，第37页。

同考茨基)身上:以具体资料证实唯物主义方法,并驳斥流行于资产阶级学者的这个观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零零落落绕进了历史学……以支持他们创造的历史理论”^①。

阿尔都塞的再解释

第二国际的著作家们把握了历史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概念框架的建构作用。他们也特别觉察到《资本论》中的历史思想。但是,这如何发生,历史的要素与结构分析的要素彼此如何关联,他们仍未把握。阿尔都塞学派已经做出的无可争辩的功绩,在于有力地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困难。它的代表人物属于后存在主义一代,这一代——厌倦于对“青年马克思”^②的空洞崇拜——开创了对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其精细的研究。这种研究旨在建立概念的精确性和科学的客观性。在原则上,如果这种精确性未带来这个结果:即以理论上表达为“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观点的名义,将马克思主义概念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加以拒斥,那末,这将会受到极大欢迎。结果是,关心一个更为人道的社会,依然是一个在实际的理论过程中既是外在的又是无根据的道德公设^③。在这个研究项目及别处我已经谈及过这个问题^④。如今这一点可能使结构主义的马克思解释与本文自身面

① 弗兰茨·梅林:《论历史唯物主义》,第36页。

② 尤其有关来自阿尔都塞及其学生们对马克思解释的法国意识形态——历史的一些假定,参见我的论文《对历史的结构主义抨击》。

③ 有关“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这种理论贬值,请见乌尔斯·耶格恩在他著作中清晰的分析:《有序和混沌:作为方法和模式的结构主义》,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8年,第154页。

④ 请见施密特的《对历史的结构主义抨击》,第202—204页。

临对立。

长期来，马克思主义文献一直呈现的，正如列宁所说（而且他的观点代表着许多作者的观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供了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上和历史上的分析”^①。无疑，列宁认为，这个引文中的“和”是重要的。他断言在有关它的充分发展形式的“资本主义的抽象理论”^②与历史之间的一种割裂将与这样一种理论忽视这种充分发展形式的起源方面的程度同步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的草稿《大纲》中发挥了这个思想）。列宁也强调了正统思想不允许“用抽象的公式掩盖历史问题”^③。而这种抽象公式直接来自思维的构成物。列宁要求一种特定的研究，倘若这样一种研究是在唯物主义框架内实施概念化。虽然抽象的理论必定来自历史世界，但在研究中，“抽象的理论”问题将不会同“具体的历史”^④问题混淆起来。

“新科学精神”的哲学： 作为科学的建构史的认识论

列宁所论及的理论同历史之间的割裂，构成为结构主义的马克思解释的出发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者决不会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2页。

② 列宁，《非批判的批判》，《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第565页。

③ 列宁：《再论实践论问题》，《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76页。

④ 同上书，第77页。

主张，只是结构主义者发现了和考虑到这并不是学术问题^①。但是他们以理论与历史的不成熟的和谐从一开始就被排除的这样一种激进的形式，提出这一点(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说，这样一种和谐是正确的，但恰恰是由于这种抽象水平，不成熟和谐对解决割裂贡献甚少或者毫无贡献)。

要理解阿尔都塞主义的意图，需要我们考虑它能产生于其中的精神氛围。阿尔都塞之所以令人置信不疑，则多亏于诸如巴歇拉尔(Bachelard)、卡瓦利(Cavaillès)、康去尔埃(Canguilhem)和福柯(Foucault)等这样一些著作家，他们曾寻求建立一种基于科学史上的认识论。尤其是，他们提出了有关通常总是过于单纯地被称之为“科学进步”的神秘直觉内容的问题。我们说的“科学进步”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标准能恰如其分地判断从一种理论向另一种理论的过渡？什么东西可区分前科学概念或非科学概念，或者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可区分意识形态概念同科学概念之间的差别？

巴歇拉尔，当代认识论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深入细致地从事这个问题。他的“科学发现的哲学”^②(这被假定给了结构主义的著作家们极深印象)抵制了实证主义的(尤其是孔德主义的)历史与科学哲学的融合^③。在巴歇拉尔看来，满足于在

① 最近几年，许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历史关系问题的重要著作已经出现。除了那些已提及的，格奥尔格·门德和艾哈特·朗格编的论文集：《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实际哲学意义》(柏林，1968年)和奥托·莫尔夫的1951年版著作的修订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和辩证法：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的关系》(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70年)。

② 关于这点，参见保罗·吉奈斯梯尔所作的有益的和文献学上有用的研究：《巴歇拉尔的思想》，巴黎，1968年，第25—123页。

③ 参见同上书，第26页。无疑，孔德本人是结构主义的历史思维的奠基人之一。关于这点参见米歇尔·佩舍和米歇尔·非尚的受阿尔都塞主义感悟的著作：《论科学史》，巴黎1969年。

“一个进化的公式里通过追溯以往安排新的发现，正是思想历史主义化的惰性。他主张，虽然传统的历史著作总是试图紧紧跟踪各种科学，但它极少能够以科学的断裂、危机、和突变来把握它们的真正动力。囿于过去的内容，它在新东西中所能见到的仅是旧东西的改进了的变体。巴歇拉尔写道，同这种“要在一些旧发现上放置种种新价值的镶饰的经常发生的乐观情绪”^①作斗争，是有重要意义的。他把在哲学家和学者之间的不安归咎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史。因为后者向忠实地跟随发现过程的哲学家们要求他们提供这样一些发现是受以往出现的事物决定的证据。相反，巴歇拉尔试图表明，不但从历史上说，而且从一般分析意义上说，对哲学家们提出的这种苛求是多么谬误。因此，他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评论说：“从历史角度说，相对论的发表……是令人惊奇的。如果确有不用历史的前例作解释的一种学说，那它就是相对性的学说。”^②在论及认知过程中逻辑的东西与暂存的东西之间关系方面，巴歇拉尔解释说。他明确反对关于历史的朴素的线性思维：

“人们易于认为，种种科学问题依照日益复杂的事物的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出现……(持这样一种见解的)人忘记了，这种寻觅到的解释把清晰性带给既定事物，制订出简化和指导经验的公式，并忘记了一种局部的解释符合整个体系或可能成为一种辅助力量。”^③

① 加斯东·巴歇拉尔：《科学精神的形成：心理分析对客体认识的贡献》，巴黎，1936年，第123页。

② 加斯东·巴歇拉尔：《相对性的归纳价值》，巴黎，1929年，第6页。

③ 加斯东·巴歇拉尔：《关于物理学问题演变之研究，固体的热传导》，巴黎，1928年，第7页。

对巴歇拉尔(对他的结构主义追随者也一样)来说,有两件事至关重要:第一,如果科学史打算满足认识论要求,它必须溯及既往,即是从最先进的观点出发作研究。第二,知识的进展并不符合从简单事物向复杂事物过渡的进化原理。由于越是抽象的就是“越简单的”这种理论,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相反是通过对以往的思想过程的成果加工而成,并且,理论到达了概念(在黑格尔主义意义上的)越是“具体的”就是内容越丰富的程度。

巴歇拉尔、康吉耶和阿尔都塞的著作包含着有关科学史的历史过程的仅仅一般性的思辨,这是他们的特征。他们接受下列观点的指导:即他们的认识论问题来源于专门的实体问题^①。所要解释的事是,或多或少涂上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过渡到严格的观念成为可能的这些条件。这预先假定,把科学史看作为仅仅是以往失误的废品间的见解是错的。这样一种见解只有在知识的明确的最终状态的基础上,才会得到证明,然而,那是不可能的。所有理论均处理已由理论过滤过的各种事实。因此,根本没有最终判断能施加于这些事实上。事实出自各种理智解释,而后者比起最近的知识水平来常常是较陈旧的,并且出自完全不同的科学领域或技术领域。认识论学者不可能让他们被动地接受外在的年代学指导^②。

^① 正如乔治·康吉耶在他的著作《在17与18世纪反映概念的形成》(巴黎,1955年)中曾指出的,反映曲线发展的理论史显示出,处于严格条件下的反映这个词成为一个科学上应用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来源,不出自“机械论的”,而是出自“活力论的”问题,通过考察变得昭然若揭了。关于康吉耶,请见安德烈·努瓦雷的《从福柯到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到现象学的哲学》,巴黎,1969年,第56页。关于整个现代法国认识论,请见弗朗索瓦·盖尔的卓越论文《认识论》,同上书,第120页—149页。

^② 见努瓦雷:《从黑格尔到福柯、从马克思主义到现象学的哲学》。

阿尔都塞理论中巴歇拉尔 主义的各种预先假定

对阿尔都塞的马克思解释是最重要的“新科学精神”^①的概念，是巴歇拉尔主义的认识论上决裂的思想^②，后者是这样一个概念，它涉及理论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决裂（一个“切口”），这个决裂既影响到理论方法，也影响到它的对象，还意味着科学论述的一个新问题、新水平。巴歇拉尔着重指出，科学家史是同“已经消失的科学精神的古生物学”^③打交道。在他看来，当代科学与以往科学之间^④，并不存在任何种类连续性。认识论上的决裂所拆分的各历史阶段少于各对象领域——例如科学论决裂脱离开使我们面临常犯错误的映象与符号的决裂。

认识论这个术语在法语中具有的意义比在德语中狭隘。后者涉及到探究逻辑、形而上学和心理学的无人地带。它（明显地打上康德的烙印）反思客体性中的主体性成分。相反，法语的用法在认识论和知识论之间作了鲜明的区分。知识论仅仅对存挡于教科书有兴趣。从笛卡儿到胡塞尔的主体的推动看上去背时了，在当代法国尤其如此。另一方面，正如巴歇拉尔所写的，认识论乃为一门元理论的学科。

① 关于这个概念，请见盖里的《认识论》。

② 参见同上书，第130页。

③ 同上。

④ 然而，按照巴歇拉尔用“比热”（这出自布莱克在1760年对热量与温度的区分）的概念这一术语的解释，当代思想对早已过去的事感兴趣，因为它们的一些概念已被吸收进科学之中。

“认识论的研究对象是各种科学概念的形成和过渡，它们如何从科学到科学发生变化，研究领域是如何构成的，按照规则它通过连续的变换被组织起来，并且同它本身的规则有关，实践如何会意识到它的方法。”^①

这种特征表明了，认识论思维并不旨在确立传统的科学实践的主导形式。这预先假定它是历史素材，并只是想要帮助它达到明确的自我意识。这种科学新精神的哲学摆脱较陈旧的实证主义的程度，在巴歇拉尔尝试修正科学史思想中，是显而易见的。用努瓦雷(Noiray)的话说，科学主义是“不忠诚的实证主义”^②。它同直线地解释历史的有疑问的关联，必定扩展着它的理性主义一建构的特点，在法国尤其是如此。然而，由于它超出这篇更详细地探讨出自讨论科学主义的各种问题的论文的框架，对强调以变化的形式参与阿尔都塞事业^③的一些特定要素，我们必定是满意的。

巴歇拉尔科学现代性的概念是辩证的概念^④，只要它拒斥笛卡儿主义的理性主义，由于后者的不变性，它声称支持一种“近似的知识”是无可争辩的。他写道：“近似是一种不完全的客体化，但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想象力丰富的、真正合理的客体化，因为它意识到它的进展的不充分性。”^⑤换句话说，认知不是一种单个的、唯一的行为，不是一些固定命题的目录。相

① 努瓦雷编：《哲学》，第119页。

② 同上书，第221页。

③ 关于发生理论与历史理论之间的联系，我遵循盖里的《认识论》的解释。

④ 关于巴歇拉尔的辩证法的概念，请见吉内斯蒂埃的《巴歇拉尔的思想》，第39—46页。

⑤ 巴歇拉尔：《论近似知识》，巴黎，1928年，第300页。

反，它是一些多种多样的分叉过程。科学理性总是隐藏在广泛而又密集的无数实际事物后面这个事实，并不是认知过程可回避缺陷的证据，毋宁说它显示出它的基本的合乎规律性。巴歇拉尔坚持认为，理性丧失了从理性主义角度支持理性的自主性。理性已经纳入了科学的道路：

“理性必须服从科学，服从最为先进的科学，服从在演进中的科学。理性没有权利奖赏直接经验；相反，它必须同最富有结构的经验保持平衡。无论如何，直接的东西必须服从构成的东西。”^①

在这种理性与科学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巴歇拉尔发展了一种明显的非笛卡儿主义的认识论。它的出发点并非是一些意识不能降低作用的事实，而是这个思想：即一切科学活动是服从于在理性的东西与经验的東西的两极之间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在这种辩证法的发展过程中，“理性的真理”同“经验的真理”一起发挥作用^②。两者都失去了它们的抽象的同一性：概念的构成显示出它们的相对暂时的性质，正如经验研究描述的结果所显示的一样。巴歇拉尔论及“应用的理性主义”将动力赋予理性，这是用“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实在论）来补充的^③。无疑，后者只不过是一种朴素的感觉论：“所有科学哲学的进步，在日益发展的理性主义方向中进行，消除……最初的理性

^① 加斯东·巴歇拉尔：《否定的哲学：新科学思想的哲学》，纽约，1968年，第122—123页。

^② 吉内斯蒂埃：《巴歇拉尔的感想》，第36页。也可参见第43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主义。”^①巴歇拉尔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沉思的批判，倘若他大大地强调必须把知识的对象看作为“加工过的对象……(一种)文明化了的对象。现实事物的领域延伸进实现的领域。于是，将会容易地……证明各种理性因素已介入实在和实现之间”^②。巴歇拉尔没有推进一种集体实践(客体的、具体的活动)的实体概念，这并不重要。因为他在一种抽象科学的层次上，指出纯自然的日益增长的不可能性。以前“既定的东西”变成某种“制造的东西”。学者们所论及的各种对象，一直不停地在变化发展。例如，在化学中，并非把物质当作自然沉积物来研究。因而，“现实的东西”也被定义为“实现”^③。

与传统的科学史家不同，巴歇拉尔学派的认识论学家并未将历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想，看作为可从年代学上加以分类的各种事实。相反，他把各种事实看作为各种思想。他假定，一切经验的东西(包括用于可计量的东西的研究器具在内)总是某种已经从概念上加工过了的东西；用巴歇拉尔的话说，它是“一条已实现的定理”^④。科学才智只是凭借它本身的各种假设、大纲和概念，能够探讨客观存在。实验也成为思想过程(并不是它的辅助手段或替代品，反而是“新的实在的产物”)^⑤的一种无可争辩的要素的程度，也就是知识从理性的东西向现实的东西进展的程度。巴歇拉尔声称，我们的思维产物以及同它们有关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改进。

巴歇拉尔，依据他的一个法国解释者盖里的说法指出：一

① 巴歇拉尔：《否的哲学》，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④ 盖里：《认识论》，第131页。

⑤ 同上。

种新的思想形式是综合地产生于“唯理论”与“唯实论”之间“对话”。在不否认理性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的条件下,这两个要素彼此间相互补充校正^①。这种经验上唯实论的设计(不顾客体的一切概念中介)标志着“新唯理论”^②同实证主义的经验论—感觉论的各种传统之间本质区别。从休谟经尼采到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实证主义拒斥自在之物可知性的论题。对于这些传统来说,这样一种存在与未经证实的形而上学是同义的。这种反对显然已不能动摇现代唯理论者的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他们继续坚持意识之外的有序的存在。尽管他们对表面的结构进行批评,主体的反思依然是异己于他们的。巴歇拉尔还再次澄清他解释的影响,不仅用像马克思那样从现在推知过去的科学史上修正过的概念,提供给结构主义方法论;此外,他还指出研究新生态状况的科学是多么重要。当巴歇拉尔论及某个新东西出现时,他决不局限于明显勾划出的历史停顿(认识论上的决裂),而相反是针对某种无限重复的东西;一般说来,进步明白不幸的僵化是它唯一抉择,而进步就在于同它作不停的斗争^③。巴歇拉尔把整个科学发展看作为连贯的非连续。他这样看时,就背离了本格森。因为本格森的生命形而上学和知识出自“具体的绵延”和“实在的运动的连续性”^④。巴歇拉尔论证说,在每一个阶段,方法论的思维必须避免堕入唯有映象的经常性的危险。这里,他论及到一种“认识论上的障碍”^⑤,这正如盖里(Guéry)所强调的,不能理解为某个能搁到一边的外

① 盖里:《认识论》,第131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32页。

④ 亨利·本格森:《形而上学导论》,载《材料与回忆及其它论文》,法兰克福,奥因河畔,1964年,第34页。也可参见第35页。

⑤ 盖里:《认识论》,第132页。

在于科学的某个东西。他写道，科学更多的是“一种只有通过回顾使它的障碍展现的纯粹创新、创造”^①。因而，只有在描述氧气以后，对燃素的信仰证明就是这样一种障碍。

认识与实在发生关联，是较早期活动的产物，它是需要进一步改造的构成物，由理论本身创造的理论中心点是建立在材料的相关性上。在概括巴歇拉尔的思想中，盖里写道，科学产生调整旧结构因而创造新对象的各种形式^②。由于这样坚持认识过程的积极活跃的创造性的特征，巴歇拉尔不仅接近社会劳动的特征，而且也像尼采一样，接近艺术生产的特征。我们现在将论及这种接近的有疑问方面：它对活动(实践)、对活动与工艺同一化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方面考察)不适当的定义^③。

构成物和唯物主义科学史

在科学史新解释的基础上的现代唯理论的认识论的确立，对结构主义的思考历史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按照巴歇拉尔所说，我们的知识进步并非在平稳的过渡中进行，而相反是跳跃式地突然发生。我们以前称之为“发展”或“生成”的东西，现今它呈现为“唯一的和新的瞬间”^④(就概念保存一种发生意义上说)的连续。当代属于阿尔都塞集团巴歇拉尔主义的(以及夸

① 盖里：《认识论》，第132页。

② 同上。

③ 罗兰·巴尔特的论文《结构主义的活动》中写道：“每一种创造的实质”是“工艺”。载《批判的论文集》，文凡斯顿，1972年，第216页。

④ 盖里：《认识论》，第132页。

雷主义的)设计的拥护者和继承者们,把一种“非连续性的观点”同以前的“连续性的观点”^①(诸如由布伦希维克(Brunschvicg)和杜恒(Duhem)所主张的)并列起来。后者所承认的正是前者所否认的,即那里存在着一种贯串每个发展阶段的知识固有的连贯性(以及制约着知识的现实历史的连贯性)。尤其是,“非连续性的观点”,至少就其含意而言,否认了在前科学生活世界的科学思维的萌生^②。这展示了,科学水平总是通过一个与遗留下来的问题域^③的决裂而达到的,而在其一些概念与无意识地起作用的映象与神话一起发挥作用的范围内,这个问题域是意识形态的。^④意识形态问题的这种决裂,并不意味着它将追求更合适的手段。相反,论述的新水平出现了,这不是(在黑格尔主义的意义上)超越以往的水平,而倒不如说是完全地取代它。

当然,甚至结构主义科学史家不得不承认,在认识论上决裂之后,判断各种思想形式是意识形态的,决不构成一个只是模糊地带。甚至巴歇拉尔论及到一大串实证的、持续的错误,而阿尔都塞主义者给予它的校正和批评(意识形态内的决裂)^⑤存在于意识形态的分界线内。此外,先于科学的最初的哲学意识形态准备科学基础到达什么程度,他们就承认到最大程度。阿尔都塞声称,每一种科学的意识形态的史前时期是一个“积累

① 参见非尚和佩舍,《论科学史》,第8—9页。在这里及下个部分所引用的一些见解来自佩舍和巴利巴尔所介绍的一些解释。

② ③ 见同上书,第9页。“非连续的观点反对作为从‘普通理解’到‘科学理解’,从科学开端到现代科学的一种连续发展的‘知识’概念”。

④ 同上书,第9页。在这里人们再次看到占大量篇幅的结构主义的隐喻。

⑤ 关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落后于马克思之处,请见《保卫马克思》,第227页,以及我的论文《对历史的结构主义抨击》,第199—202页。

⑥ 参见非尚和佩舍,《论科学史》,第10页。

过程……产生决裂的危机时刻的形成时期”。^①然而，这种承认并不意味着结构主义者同马克思一起，相信黑格尔主义的下述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②。取而代之，他们强调：对一个专门的科学问题的单个突破，是多么以先于它存在的问题的陈述为基础。但是，他们拒绝把这些充满错误、大都是尝试性的努力视作为构成超越它们的各种新的首创性的形式。另一方面，已引进辩证唯物主义的“度量关系的结节线”^③的黑格尔概念，预先假定“进展的逐渐性”和“从量变到质变”^④的爆发性过渡构成一个矛盾（“量的进展……被完全中断”^⑤），并没有由此取消运动同其自身，也就是“底物同其自身”^⑥的普遍统一。对黑格尔而言，恰恰这种对立是实际情况。他强调说，把新质的出现想象为倘若这个过程能被追溯到一个渐进的生衰的普遍概念，这是多大的谬误。相反，黑格尔以为，新东西产生于突然的“渐进性中断”^⑦，这个突然中断又自相矛盾地引起直线发展。正如黑格尔所说：“底物在这种演变中持存。”^⑧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黑格尔更喜用不连续这个术语——形成辩证的统一，而这就连续性和不连续都不能声称各自把握真理而言。两个范畴、一些数量要素，具有彼此相互参照的意义。用黑格尔的话说，“连续性只是作为不连续东西的统一的紧

① 参见菲尚和佩舍：《论科学史》，第10页。着重号是原有的。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42页。

③ 黑格尔，《逻辑学》，第336页。

④ 同上书，第370页。

⑤ 同上书，第368页。

⑥ 同上书，第374页。

⑦ 黑格尔，《逻辑学》，第370页。

⑧ 同上书，第372页。

密连贯的统一”^①。

这里，黑格尔对有的逻辑所作的各种思考具有相当多的用处，不仅由于它们搞清了在科学史过程中从旧理论产生新理论（或原理）的巴歇尔和阿尔都塞的问题^②，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它们阐释了一般历史问题。

关于新理论出现的问题，为解决它的结构主义的努力根本不新鲜。我们所接受的他们著作中某些方面，在今天被指责为从事历史哲学思辨的著作家（如孔德、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著作中已可找到。

作为科学史家的孔德、黑格尔和马克思

在曾经对科学等级作总的探索的《实证哲学教程》(1826)的第二讲中，孔德讨论了叙述方式的问题^③（这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主张每一门科学能用两种根本不同的方式叙述，因而一切进一步的努力只不过是它们的结合。孔德声称，这两种方式是历史的叙述方式和学理的叙述方式。前者先后相继地叙述它的发现，即尽可能与它们在人的精神中实际出现的次序相一致。后者发展为由个别学者作出的如今能概念化

① 黑格尔：《逻辑学》，第199页。

② 包括结构主义以外的研究者的论文在内的，有关当前连续性的非连续性思维的热烈讨论，请见这部有启示性的文集：《连续性问题：艾克·哈贝兰特、弗里德里希·考尔巴赫、乔治·迈、京特·米勒和汉斯·沙费尔的五篇讲演》，美因兹，1970年。也可见B·M·凯德洛夫的《论概念演变的范围和内容》，柏林，1956年。他的著作针对列宁的下述论点：各门学科的思想史以集中的形式凝聚成辩证逻辑。他考察了门得列夫的元素概念史上的从量变到质变的过渡。

③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巴黎，1936年。

的观念体系，而学者努力从一种合适的观点出发把科学描绘为一个分化的整体。每一门新兴科学的研究均起于历史的方法；它的教学法必定局限于论述按年代顺序，对科学进步作出贡献的各种不同的著作。对比之下，学理的过程就不大考虑年代学的方面。这假定为，各个个别的著作已被编进一个总体系之中，它们只能在这个体系的上下关联中按照逻辑顺序（孔德称之为一种“更为自然的”顺序）得到叙述，这样的叙述反过来也需要所讨论的学科高水平的发展。一门科学越是分化，它能作历史地描述越少；从事于这件工作的那些人将会不得经过一大串中介环节。这不是学理方法的实例。在孔德看来，它之所以日益受欢迎，乃由于一些新理论概念登场，是能够更直截了当地叙述以往的种种发现。因此，他谈到“人的精神的永久趋势，对于意识的说明……日益用学理的顺序替代历史的顺序。只有前者能使我们的才智达到完美的状态”^①。

就孔德承认学者的实践必然总括为学理地和历史地组织材料的结合，在结合中前者愈益成为更重要的而言，人们公认他削弱这个论点。但是不能过于严格地运用这个学理原则。它要求对所接受的知识作一个逻辑—建构的订正，但这在最近阶段几乎是不能履行的。而且，孔德察觉到，叙述的学理方式显示出一种缺陷，倘若它反哲学思考地和粗暴地割裂了这些来自它们发生过程的完成的结果。然而，按照孔德的说法，他的反对会是特别令人不安的，那只是在他明显地为“历史的顺序”作辩护的时候。可是，那根本不是这种情况，因为对一门科学的年代学—历史的研究，极大偏离了孔德称之为“这门科学的生效

^①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71页。

史”。^①后者比一目了然的东西包含着更多的内容。不仅存在各种不同的科学领域以及各门科学——按照学理上的序列彼此相互分开——同时地在相互影响下发展，而且人类精神的进化也同社会的进化密切相联系。所以，孔德强调在人类历史及其社会组织^②的普遍联系中研究科学史的必要性。从这个观点看，至此以前在数学、天文学和医学等历史中所搜集的文献，可认为只是死材料^③。

孔德对这种臆测的历史叙述方式提出尖锐批评，后者本身依附于要其严格遵循的某种假设的和抽象的东西；科学史依然是同社会生活过程相脱离的事实，倘若科学史实际上构成其最重要的因素。因此，孔德强调设想内容更为丰富并奠基于社会学上的科学史的重要性。换言之，谁要变得真正熟悉所研究的一门分支学科，谁就必须掌握它的历史。不过，——这把孔德的思考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思考联系起来^④——坚持科学史（和科学的历史编纂学）为一方，它的学理的研究为另一方之间的实际区别，这在将来定会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区别，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的结尾处，绝非偶然地返回到历史，会变得全然不可理解了。

黑格尔与马克思对孔德所讨论的问题，持有类似的观点。思辨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明显地在“哲学史过程”与包含具体的

① 奥古斯特·孔德：《实证哲学教程》，第72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奥斯卡·古格特在他的博士论文《孔德与黑格尔的社会学说之间的结构关系》，（法兰克福，美因河畔，1964年），以非常有启发的方式考察了早期实证主义与辩证思维之间的错综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伊林·费切尔为他的孔德的《实证哲学论》（巴黎，1844年）的德译本《论实证主义精神的演讲》（汉堡，1956年）所写的序言，第XVI页。

“思想总体性”^①的哲学的“本身过程”^②之间作了明显区分。(黑格尔曾置于更坚实基础之上的)哲学史研究服务于后者的知识,这种知识一旦形成,就活动于它自身的媒介物中,并且被断绝后路。政治经济学批判家马克思,同样严格地保持历史与体系彼此相互分开。“叙述方法”是建立在“研究方法”基础上的,但在“形式上”,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是不同的^③。按照最新的文献,始于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已把他的经济学著作划分为专门的理论部分和历史部分^④。同系统的关心比较,从一开始,后者就降低了重要性。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反驳普鲁东的不能接受的提议,按照这个提议,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⑤。并且在结构主义著作家们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道: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大在于它的在“观念上”(普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

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3卷,第176页。

② 同上。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23页。

④ 关于这点,参见W. S. 维戈特斯基的重要著作:《一个伟大发现的历史》,伯林,1967年,尤其是第1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5页。

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①

我们也应该回想到科学史家马克思，是一个十足的辩证法家，以致不会盲目忠于科学的历史过程。尤其是，当政治经济学表明，到达它们的真正出发点，只有“经过许多弯路。科学和其他建筑师不同，它不仅画出空中楼阁，而且在打下地基之前就造起大厦的各层住宅”^②。

无疑，马克思所考察的“资产阶级经济制度”^③只有借助于（作为现实历史体现的）经济学史，方能得以构思。但是，它的结构的“叙述”逻辑，决不与将经验材料提供给“研究方式”的历史过程相一致。不仅是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而且也是《资本论》，都证实了马克思对理论的历史源泉的研究的重视程度。脚注，尤其在《资本论》第1卷中，包含着这些研究痕迹的记录^④。它们的结果消失在马克思的体系中，这正如成衣匠的劳动消失在一件制成的外衣中一样。

结构主义的科学史和历史哲学

最清楚地显示出，所叙述的历史的内容同它在逻辑上排列过的、系统化了的内容相符何其少的，就是自然科学史。如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7页。

④ 关于这一点，参见恩格斯在《资本论》第3版序言中对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式所写的一段话：“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资本论》，第1卷，第32页。

自然科学达到一定水平，认识、甚至反思引导它的历史过程，变得比以往时候更加无可争辩了。这些过程在一定社会范围内的功能直接得到阐明。从未研究过医学史、物理史或化学史的某个人，不会由此必然是一个不好的医生、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从这点说，结构主义的科学史得出（不顾这个一直存在的连续性问题）的结论，决不是同辩证法不相容的。由孔德、黑格尔和马克思所预见的这些结论，达到令人惊异的程度，已经被勾划出来了。

严重的分化产生了，然而，如果结构主义者宁愿教条地把他们的科学史的观点转移到一般历史方面，这样，正如列斐伏尔指出的，就彻底剥去历史的戏剧内容。毫无疑问，在这个历史思维的理论转折点，一种反哲理的趋势呈现出来，因为哲学的结构和论题不是独立于它们自己的历史（更不用说独立于世界历史过程），正像定向于确切的数学概念的各个单门学科的结构和论题不是独立于它们自己历史的一样。

反之，孔德、黑格尔以及（在仍要说明的意义上而言）马克思，也依然是历史哲学家（虽然具有不同的意向）。当然，孔德将科学的学理结构置于它的时间发展之前。但他并不由此放弃把他的众所周知的“三阶段规律”描述为“人类智力发展的规律”^①。对孔德来说，这种规律是同所有理论的和实践的努力有关联的促成统一的历史主体^②。他所假定的同各种基础科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固定不变的等级制度和适应的“包含各种学科的”规律，企图把它们彼此间

① 孔德：《论实证主义精神的演讲》，第5页。

② 同上书，第41—51页。

“学理上的依赖性”同时解释为一种“历史的顺序”^①。孔德渴望表明一种在“实证精神史”中几乎未曾注意过的连续性，一种“从最简单的数学思想过渡到最高级的社会思维”^②的连续性。既然包含各种学科的原理也用来在每一基础科学中确定合理的分支，那么各个学理阶段与历史阶段彼此能密切接近，正如比较的精确性或(从一方向另一方)顺利过渡所需要的那样^③。

黑格尔，这个具有思辨体系的思想家，按照他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而言，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历史理论家(和历史学家)^④，并且其本身已打上现代意识的烙印，断言那不需要进一步详细阐释。需要强调的，是那些有关理论与现实关系的方面。

同表面的批判相反，“世界历史的理性观”并未在违反它们的材料的先验结构中作详尽无遗的论述。黑格尔强调指出“对理性洞察的渴望，[和]对知识的渴望，不止是对一大堆事实的渴望”^⑤，能用一些虚构的概念来满足那是微乎其微的。确切地说，“在历史中，思想是从属于既定的事物和存在的事物的”^⑥。他坚持认为，我们必须尊重面前的材料，并“必须历史地——经验地进行处理”^⑦。

然而，——这对把可感觉到的事实表面现象同它们的真实内容区别开来的一种领悟科学来说，是合适的——“理性呈现出不只是与通常已发生的事情保持一致的内容”^⑧。鉴于一些

① 孔德：《论实证主义精神的演讲》，第203、209页。

② 同上书，第211页。

③ 同上。

④ 列宁在他对《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中指出了这一点。《列宁全集》，第38卷，第264—263页。

⑤ 黑格尔：《历史哲学》，纽约，1956年，第10页。

⑥ 同上书，第8页。

⑦ 同上书，第10页。

⑧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莱比锡，1944年，第10页。

认识论的缘由，建构史同经验史彼此岔开，不是由于哲学是从同它的设计相矛盾的素材中抽象出来的。总之，黑格尔承认，存在能被纳入理性的固有进步的许多东西，而只是有极大难度罢了。

在世界史上，存在着显然经过了未保持连续的好几个伟大的发展时期：

“相反，在那些时期以后，在文化中整个巨大的得益已被毁灭了，并且遗孀得很，借助于免于毁灭的那些宝藏的某种支持，借助增强无法计数的精力和时间的耗费〔人〕不得不倒退到顺序的起始点……，再一次到达早已赢得的文化领域。”^①

当然——这显示出他的方法上有疑问的唯心主义方面——黑格尔由于把客观的见解归属于不合适的思维，立即放弃它。在《世界史哲学》中，黑格尔继续写道：谁拘泥于“普遍发展的形式原则”^②，谁就决不拥有确定的标准，并且忽视

“发展……并非(是)仅仅平平安安，毫无冲突地发生，如同有机生命的出世一样。相反，它是反对自身的繁重厌烦的劳动……是从特定的内容中提出一个目标。从一开始，我们已确立了 this 目标：它是精神，而按照精神本质，它是自由概念。这是……发展的主导原则，通过它，发展获得它的意义和重要

①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性。”^①

黑格尔还写道，如果没有充分把握世界历史过程的固有目标，那么，必然的前进或倒退就呈现为一种“外在的偶然事件”^②。

肯定地说，黑格尔成功地使历史过程服从于一个统一的考察方法，对于这种考察方法而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相一致——偶然事件的表象是一种深层规律的客观表现。但这种成功是以高昂的代价得来的。黑格尔发现叙说神义论是必要的，鉴于迄今为止历史一直是由“大量的具体罪恶”组成，神义论则使思维精神同否定的东西相和解^③。人们受到莫可名状的苦难出于不大考察这个思想：“各种特殊目标丧失于一般目标之中。”^④这种正在发展的和已经发展的总体性构成各个个人的实质。黑格尔甚至不会给予毫无例外地只是“终究在家中”^⑤才有的慰藉。黑格尔写道：“哲学是……更高层次的。它调和美化现实的事物，后者对合理的事物来说似乎是不正义的，显示出它是以观念本身为基础的，对此理性是应该满意的。因为理性是神的显示^⑥。这样，黑格尔把历史的内在目标解释为“世界的最终目标”^⑦。

我们知道，黑格尔的唯物主义的学生们完全拒斥神学的光环，而他用它环绕世界历史过程。然而，他们同时坚持他所主张

①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第132页。

② 同上书，第133页。

③ 同上书，第25页。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第55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书，第27页。也可参见第29页。

的历史并非是不相关联的事实的混沌状态的理论。相反，它叙述可供研究的超个人的结构和趋势。依据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不专注于个别的孤立境况，而是专注于一个贯穿整体的普遍观念”^①。在许多地方，黑格尔描述这种(唯物主义能由此出发的)观念，是相当直截了当的。他写道：观察的理性“在显现和消失中见到人类世代在各个方面劳动中发挥的作用，见到真正存在于我们所属的世界之中的作用。”^②

个人的自觉活动，但它对于总体的结果来说仍然是无意识的，面对(的确，凭借于)所有断裂和跳跃，确立着这个过程的持续的相互联系。对黑格尔而言，它的各个必然的阶段“只不过是普遍精神的一些要素，普遍精神通过这些要素提高到并使自身转变为一种自我领悟的历史总体性”^③。论述马克思主义同黑格尔、尤其是对《精神现象学》的关系的最新文献详细地指出了，黑格尔的“精神”的各种规定借自社会劳动的范围到了令人注目的程度^④。鉴于结构主义致力把历史实践的世界一建构作用的思想作为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不予考虑，而这是应该被想起的事。

至于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他们比起孔德或者黑格尔所提出的要多得多的困难问题。这是一些产生于一种奇特的双重批判的问题。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们可被视作为当今(发展中的)“结构主义者”。在《资本论》中分析的逻辑过程和以此为根据的历史理论思想，同其它的来源一起，显示出它们反对一种素朴一线性的历史观念。我已经讨论过这种观点的技术上

① 黑格尔，《世界史哲学》，第9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同上书，第53页。

④ 在同上书第50页上，黑格尔写路，“精神本质上是它的活动的产物，它的活动是直接性的超越、直接性的否定，并且回归自身。”

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卢卡奇第一次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指出过这点——旨在“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破除资本主义的直接性，而后者每天以它们的生活关系的类似自然的不变性欺骗人们。卢卡奇表明，甚至来自晚期资产阶级时期的（相当于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历史主义，完全不能恰当探讨这个由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为一个体系所提出的这个“基本问题”，“历史的扬弃”的问题。用卢卡奇的话说，“现在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存在的未解和费解的事实性，获得了一种永恒的自然规律的光泽或者一种永存于世的文化价值。”^①他又补充说：“如果我们把现状这个问题看作为一个历史问题”，“资产阶级理论的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特征”^②就最醒目地显现出来了，卢卡奇的著名的早期著作，（不管对它的历史“灾变理论”当今所有的批判）成功地默认了制度和历史过程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历时的和共时的考察方式之间决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各种经济范畴表达了历史运动的各个真正要素和阶段，它们的内在联系构成“现存事物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③。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57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批判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中这种对历史的敌视性：“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4页。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恰恰返回到这些考虑，不过如今是在一种完成了的商品分析中进行的。此时，马克思从一种社会构成中引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以及日常的）思维的反历史特征，在这个社会构成中“生产过程支配人”，（作为一个统一的、自觉的类—主体）“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8页。由此可见，非历史的思维是不能从由团结一致、积极行动的人们去支配未来的观点出发来分析现存状况的。

^② 同上。

^③ 同上书，第159页。

不同于当今法固定向于结构主义科学史模式的抽象的“历史学理论”，卢卡奇专注于(依然是同时期的)结构—改造的实践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活生生的各个个人和他们的命运仍然处于当今的秩序状态。人被置于压迫的结构之中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理论必须安命于只是尽可能确切地描述这种处境。整体的“主体失落”是它的批判的一个论题，而不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准则。

卢卡奇同当代的结构主义者们的区别，就是这个主张，而在其它一些方面，他明显地靠拢他们的问题。因此，历史过程的唯物辩证法或者不能受忽视，或者不能被神化，他是清楚明白的。它的各种范畴所构成的“既不是纯粹的逻辑顺序，它们也未被整理成只是同各种历史事实相一致”^①。这里，卢卡奇记住马克思的下列观点(阿尔都塞也反复强调的)：即范畴之间的接续和联系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②。在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卢卡奇无疑不会得出任何反历史的结论(即反对建构的主体性的结论)。毋宁说，他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不是压抑而是以一个真实历史的实证概念为前提的。对它重要的是

“面对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人的世界，显示出一种客观性，它——如果正确地被细心考虑和把握的话，——决不需要固执于同早先发现的形式直接性相类似的一种直接性。所以，这种客观性必须是理解为一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页。

个中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经常性因素，并证实到处是人的产物和社会发展的产物，必定是可能的。”^①

对马克思来说，在方法论上研究完成的结构对研究它们的具体发展过程的既定的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对理论的建构是不相关的。

人们会同意戈德里(Godelier)所强调的这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摆脱了每一本“经验主义的、节略的历史著作”^②。“一种结构的历史一发生的分析”^③总是以有疑问的结构理论为前提的。揭示“已经导致内在的结构要素展现并把这些要素置于相互关联之中的基础”^④，就不过是这样的分析，然而，这样一种设计在自身包含着为马克思所避免的成为意识形态的危险。一些方法论的原理不受注目地变成本体论的原理。垂直的结构压抑水平的结构。在理论上现在是次要的东西变为乌有的东西。连得马克思也是一个“结构”一思想家。但是(这使我们返回到卢卡奇的思考)，他把他所研究的状态的僵化的客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59页。这里，我们应该回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409-410页上的论断。当论及维柯时，他说：“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② 莫里斯·戈德里：《〈资本论〉的体系、结构和矛盾》，柏林，1970年，第14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同上，也可参见第18页。在那里，戈德里再一次发挥这些思想，并因此阐明他对马克思的结构主义评注的主要观点：“经济学理论的对象应该展示在这个或那个结构中的功能及其顺序，并确定从这个结构产生的各种范畴……还在一种逻辑的、观念的发生上把它们互相联系起来。但是这种发生不是实际的构成史。”它也不能替代它。而且，经济学理论即使不与经济史相一致，为分析经济史提供了指导性线索，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完全是以经济史的成果为基础的。从这个观点看，人或许能理解马克思严厉拒斥任何一种历史循环论或主张历史的研究优先于结构的研究的任何努力。……这是先于社会学的和语言学的集团的危机(这导致索绪尔和洛伊集团放弃进化的方法)50多年的一种拒斥。

观性视作为同时也是主观的，就是说，是被以往的劳动中介过的东西。卢卡奇写道：“无产阶级的历史认识起自对现状的认识，起自对它自己社会地位的自我认识以及对它的必然性的阐释（即它的起源）。”^①但是，后者同建构的历史相一致。一些从方法论上视为首要的结构就是从这方面产生的。

首先针对资产阶级科学的，就是这个观点。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写道：“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②既然官方的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普鲁东是了解含义的，马克思继续说明“这些范畴的形成情况和来历”^③。于是马克思指出，普鲁东完全不能把握范畴的东西（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否定的统一：一会儿他把现实的历史归结为仅仅是“范畴的顺序”^④，一会儿以后他相信，“现实的历史适应时间次序”^⑤直接为观念、范畴和原理提供准则。在马克思看来，普鲁东用两者中任何一方的观点去解释历史过程，都不会成功。相反，马克思认识到，原理同历史的关系问题；只有通过材料的研究才能探讨。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马克思写道：

“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

① 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15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140页。

③ 同上书，第133页。

④ 同上书，第147页。

⑤ 同上书，第146页。

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在每个世纪中，人们的需求、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难道探讨这一切问题不就是研究每个世纪中人们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不就是把这些人既当成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吗？但是，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因为你们抛弃了最初作为出发点的永恒的原理。”^①

科学的“实际出发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的一些政治经济学著作再次采用这个术语)不是与它的认识的出发点同一的。在成熟期的马克思著作中的辩证法，可说是以结构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否定的统一为特征的。但以为人们能在黑格尔主义的公式中寻求慰藉，或许是天真的。这需要进一步讨论，尤其要讨论这样一种统一的完全极易忽视的“否定性”。特别是求教于辩证法的那些人，他们经常满足于直接的(也因此仅仅是“抽象的”)正确性，并解释说问题在于不该为了结构分析方面而忽视发展历史方面，反过来也是这样^②。在指明这样一些公式不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8—149页。

^② 表现这种广泛的观点(我首先倾向于它)的特征的，是京特·克勒伯的研究，一般说来值得一读的《“结构”范畴和绝对的结构主义》，载《德国哲学杂志》，第16卷，第11期，柏林，1968年，第1310—1324页。克勒伯把“绝对的结构主义”描述为一种“分解在客观实在中结构与过程的辩证统一以支持结构的哲学观点；不是各个过程，而惟是各种结构；不是生成，而是已生成的事物……是值得研究的。对绝对的结构主义来说，结构和各种要素，并不是作为一个系统中的辩证统一而存在。相反，结构是首要的和决定性的现象，它假设有一个先于并独立于各种要素和这

解决绝大多数难以处理的问题上，严格的结构主义者们已作出了贡献。如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在于坚决地否定对历史的结构主义否定。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是恢复历史转世论哲学仍不会是令人信服的。

个系统的自我满足的存在”(同上书，第1317页)在另一处，克勒伯论述了在《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方法：“因此，马克思从不停留于……把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分解为它的各种结构这一点上。虽然他的确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同时他把它描述为是自决的也是历史地被超越的历史过程的结果。在《资本论》中，无疑他从事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分析，但是在这样做时，没有忽视批判的分析，也未忽视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以及丰富的具体经济材料。”(同上书，第1319页)在一种抽象的纯粹描述意义上说，克勒伯对结构主义种种异议，如同他关于《资本论》方法的一些实证的论断一样，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就在这个讨论的目前阶段，没有人会成功地将对结构主义提出的历史问题的合理核心置入视野之内。甚至更重要的，人也不大能从历史运动的真正“僵化”中推导出结构主义的“对历史的敌视性”。与著名的心理学家让·皮阿兹一起区分“静态的”结构主义与“发生的”结构主义的吕西安·戈德曼，主张类似于克勒伯的路线。请见吕西安·戈德曼：《结构主义》，巴黎，1968年。戈德曼把辩证唯物论表征为“普遍发生的……结构主义”，对它而言，“每一种人的给予物是一个富有意义的结构，它能通过对它的各个单个元素之间的本质联系的分析来理解……同时代表着一种包括它在内的包含更多内容的结构的构成要素。从这个观点看，每一种人的既定现实拥有一种动态的特征，并且只有当我们发现了它的以往发展和它的指向未来的内在的构成趋势，刚刚得到理解。这表明如下结论，即考察既定的东西必定产生一个过程的两个相互补充的方面：在产生过程中，一个以前的结构的非结构化和一个新的结构的结构化。”吕西安·戈德曼：《辩证法研究》，柏林，1966年，第284页，着重号是原有的。暂时不顾可能难于探索在这个枯燥的框架后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一批判的内容这个事实，戈德曼正试图结合两种互补的方法。如今同样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各个方面努力完成这一点，因此，沃纳·康采把法国样本的社会史理解为“技术——工业的时代的结构史”，由迪特里希·希尔格引自《论社会史的概念和对象》，载《书籍与图书馆》，第25卷，第1期，罗伊特林根，1971年，第21页。尼克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的理论同一个“系统——历史”的概念一起发挥作用，它的合理性是由于“社会学启蒙高于理性启蒙”(优先性)的结果。《社会学启蒙》，奥普拉登，1971年，第84页。关于整个问题，参见第82—85页。

总 结

鉴于目前在讨论历史与结构这个论题中涌现出相当多的困难，再次简短扼要地重述在这部著作中所经历程的各个阶段，可能是有益的。我们从（既有结构主义的支持者，又有结构主义的反对者）这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结构分析的方法与历史发生的方法同时并用。当然，对这样一种“同时性”包含什么内容，它意指那一种辩证法，各种观点分歧很大。只要是这些论题，我定会密切注视我曾从事过的努力，以有助于阐明这个问题。

马克思把恩格斯与他本人所确立的科学描绘为“历史运动的自觉产物”，这决不意味着认识同它的对象的历史编纂学相一致，或者说，它只是在年代学上追踪它的历史过程。如果，人们常常这样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著作家们就不会完全问心无愧，因为在反对黑格尔的无时间的本体论时，他们强调唯物史观的历史。他们有充分理由这样做；在他们看来，问题是既要显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成，又要显示它的暂时性。然而，在《资本论》中的这种显示，是作为“建构的”历史，而不是作为“叙述的”历史进行的。一旦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它就形成为延伸一个长时期的静态结构。研究它的固有规律不需要讨论它的历史起源，更确切地说，只要资本的本质未被把握住，他就不能这样做。因此，人们能论述“逻辑的东西对历

史的东西在认识上的优先性²⁹，而丝毫毋须放弃这个唯物主义的基础。

资本主义的历史与制度之间的客观的统一与差别，是在主观上反映了“研究方式”与“叙述方式”之间的统一与差别。关于后者，我已考察了这个问题的各个不同方面。我论及了马克思又一次接受黑格尔，并曾试图表明黑格尔的系统概念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的构成中起着什么样的建构作用和批判作用。在马克思之前，黑格尔说过的关于“哲学史”对它的“过程本身”的错综复杂联系的论述，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以对《资本论》的黑格尔主义遗产的这些反思为背景，这部著作考察了阿尔都塞学派与葛兰西的各种马克思解释，是有启发性的，因为它们彼此间存在这样明显的矛盾。虽然葛兰西的“真正历史主义”或“历史人道主义”将理论过程与历史的实际过程以及与历史编纂学(和实践的政治学)同一，而巴黎人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视为同任何真实的历史思想和而人道主义相反的一种“纯粹的”理论。葛兰西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他对马克思的科学—理论地位的普遍思考及他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在联系的较为特殊的一些思想，在阿尔都塞追随“青年马克思”崇拜，有力地指明《资本论》的哲学内容(当然，他是斯宾诺莎理性主义的方式解释它的)的范围内，他对马克思的再评价是有益的。不过，他被假定为反黑格尔主义地坚持范畴的结构连续与年代学的连续的非同一性，不值得很大关注。黑格尔早在《精神现象学》，更不用说他的一些后期的著作，通晓了(黑格尔的学生马克思回归的)这个问题，

然而，由于这些争论，我并未解决由阿尔都塞学派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发展了的一些概念。新科学精神的理性主义哲学，将它将认识论还原为(毫无结构主义者的缺陷，已存在于孔德、

黑格尔和马克思处的)科学建构史一起,在这种联系中是重要的,因为一般说来它构成了结构主义历史思维的重要模式。最后部分指出它是如何比作为一种旨在“革命实践”的历史哲学的。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第一批书目

1.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 [美]悉尼·胡克 著
徐崇温 译
2. 历史和阶级意识 [匈]卢卡奇 著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张西平 译
3. 交往与社会进化 [德]哈贝马斯 著
张博树 译
4.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美]威廉姆·肖 著
阮仁慧 钟石沛 冯瑞荃 译
5. 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 [南]尼科利奇 编
赵培杰 冯瑞梅 孙春晨 译
6. 论国家 [法]列菲弗尔 著
——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 李青宜等 译
7. 单向度的人 [美]马尔库塞 著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张 峰 吕世平 译
8. 批判理论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著
李小兵等 译
9. 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德]卡尔·柯尔施 著
王南湜 荣新海译 张 峰 校
10.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英]G. A. 科亨 著
——一个辩护 岳长龄 译
11.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 徐崇温 著

第二批书目

12. 实践哲学 [意]葛兰西 著
徐崇温 译
13. 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断) [德] 马克思·霍克海默 著
特奥多·阿多尔诺 著
洪佩郁 蔺月峰 译
14. 日常生活 [匈]阿格妮丝·赫勒 著
衣俊卿 译
15. 法西斯主义群众心理学 [奥]威尔海姆·赖希 著
张峰 译
16. “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 [美]罗伯特·戈尔曼 编
赵培杰 李菱 邓玉庄等 译
17.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欧力同 张伟 著
18.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 李青宜 著
19. 用马克思主义评析西方思潮 徐崇温 著
20. 社会民主与未来 [德]维·勃兰特 著
[奥]布·克赖斯基 著
[瑞典]欧·帕尔梅 著
丁冬红 白伟 译

第三批书目

21. 卢梭和马克思 [意]德拉—沃尔佩 著
赵培杰 译
22. 理性和革命 [美]马尔库塞 著
——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 程志民等 译
23. 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 [德]哈贝马斯 著
——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 洪佩郁 蔺青 译
24. 交往行动理论·第二卷 [德]哈贝马斯 著
——论功能主义理性批判 洪佩郁 蔺青 译
25. 否定的辩证法 [德]阿多尔诺 著
张峰 译
26. 自然的控制 [加]威廉·莱斯 著
岳长龄 李建华 译
27. 历史和结构 [德]施密特 著
——论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结构
主义的历史学说 张伟 译
28. 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 [南]马尔科维奇
彼德洛维奇 编
郑一明 曲跃厚 译
29.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 [匈]卢卡奇 著
——社会存在本体论引论 [德]本泽勒 编
白锡望 张西平 李秋零等 译

30. 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
——若干最重要的综合问题
- [匈]卢卡奇 著
[德]本泽勒 编
白锡堃 张西平 李秋零等 译
3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概论
余文烈 著
32.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
陈学明 著